

Autumn 2018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September No.42

2018年09月 第四十二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42 期
2018 年 09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655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编委会顾问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邱 勇 清华大学校长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曹雪涛 南开大学校长

廖祥忠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潘一山 辽宁大学校长

金 雄 延边大学校长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Regsuren Bat-Erdene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史静寰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田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杜 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azartseren Boldgiv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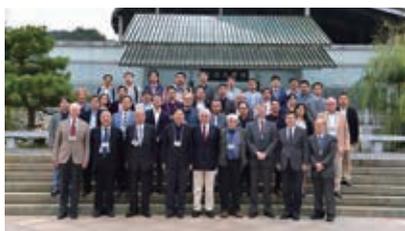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P.02

→ 2018年8月31日，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未来知识社会与大学”论坛在韩国首都首尔隆重举行，亚洲多所高校校长应邀出席。



P.05

→ 2018年9月28—30日，新时代的中国与多元文明的对话——“轴心时代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孔学堂召开。

特稿

- 02 亚洲多所高校校长应邀出席“未来知识社会与大学”论坛并发表演讲

学术活动

- 05 新时代的中国与多元文明的对话——“轴心时代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研究进展

- 07 基于教学学术的大学英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模型构建
15 《西游记》在泰国的传播、再现与衍生
27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介绍



亚洲多所高校校长应邀出席“未来知识社会与大学”论坛并发表演讲

2018年8月31日，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未来知识社会与大学”论坛在韩国首都首尔隆重举行，亚洲多所高校校长应邀出席。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延边大学校长金雄、南开大学前任校长龚克、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Bundhit Eua-arporn、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Pho Kaung、柬埔寨

皇家学院院长 Touch Sok 出席活动，并就未来知识社会的面貌以及大学的作用发表演讲。

开幕式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致欢迎辞，曾获财团资助赴海外留学的高丽大学校长廉载镐、延世大学校长金用学致辞。廉载镐校长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强调大学的作用应不再局限于传播知识，还要创造知识。金用学校长表示，丰富



的知识来源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财团设立的亚洲研究中心（Asia Research Center, ARC）网络和研究成果将成为未来重要的财富。

在第一个环节中，中国各高校校长分别进行了主旨发言，发言中涉及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融合”。林建华校长发表了题为“**Breaking the Boundaries**”的演讲。他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创造和传播知识的方式，强调大学应该打破各学科之间、理论与实践以及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许宁生校长表示学校正通过学科间的合作与融合构建创新机制，树立让大学服务于社会的目标，并积极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刘伟校长认为，融合与创新正成为新时代的主题，科学技术越是快速地改变着世界，越需要强化人文主义和哲学方面的思考。廖祥忠校长以“用媒体的力量守护人的价值”为题，阐述了随着媒体的影

响力的逐渐扩大，媒体教育的责任也随之加重，要开展以道德为中心的媒体教育。金雄校长表示，新技术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生活，也改变了教育模式，当下需逐步将教育的重心从“教（teaching）”转移到“学（learning）”，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发展将会越来越重要。龚克以“人工智能”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他介绍称，人工智能正颠覆性地改变着知识的获取、习得、构造、表现等方方面面，现在中国已有26所高校设立了人工智能中心。

演讲结束后，廉载镐校长主持了对话。他介绍了欧洲大学的交流项目——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 Program），并提出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东亚成为文明的中心地，在这个地区内的所有大学能够一起做些什么？参会校长们认为，财团设立的ARC研究中心是构建合作网络的范例，并表示亚洲研究不应该再以西欧为中心，而是要让亚洲的大学发挥主导作用。



在第二个环节的主旨发言中，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Bundhit Eua-arporn 校长提到尤瓦尔·哈拉的著作，谈到未来人类将会分为 Homo Deus 和 Homo Useless 两类，强调大学应该通过创新和国际化去适应变化。缅甸仰光大学 Pho Kaung 校长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网络化至关重要，并介绍了仰光大学进行国际合作的案例。柬埔寨皇家学院 Touch Sok 院长表示，融合与创新是柬埔寨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皇家学院作为柬埔寨代表性的教育机构，正在全面致力于开发人才资源。

当天出席活动的校长均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在中国和亚洲的主要高校、研究机构设立的亚洲研究中心担任共同理事长。从 2000 年起，财团开始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项目，致力于增进亚洲国家间的学术交流与相互理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

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延边大学、柬埔寨皇家学院、德黑兰大学、老挝国立大学、蒙古国立大学、仰光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越南河内国立大学均成立了亚洲研究中心，旨在通过支援当地活动，为开启“Rise of Asia”时代构建必要的学术和人才网络。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由 SK 集团第二任会长崔钟贤创立，今年是崔钟贤会长逝世 20 周年，也是 SK 集团现任会长崔泰源就任理事长一职 20 周年，财团特别邀请了 ARC 所在大学的校长以及各中心的负责人齐聚首尔，共同参加“未来知识社会与大学”论坛及 ARC 中心主任联席会议。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新时代的中国与多元文明的对话

——“轴心时代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举行

2018年9月28—30日，新时代的中国与多元文明的对话——“轴心时代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孔学堂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德国国家科学院科学研究中心和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哲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协办。来自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国际知名学者，我国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相关领域的专家以及贵阳各高校的学者等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研讨会的契机是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全新中译本的问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该书提出的“轴心时代”术语，已经成为研究东西方比较文明和跨文化对话的关键概念。该书1949年问世，四十年后中译本问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规范的加强，需要推出更审慎妥帖的全新中译本；北外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历经多年，第一次基于德文版，并同时参考英译本和日译本，推出了《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全新中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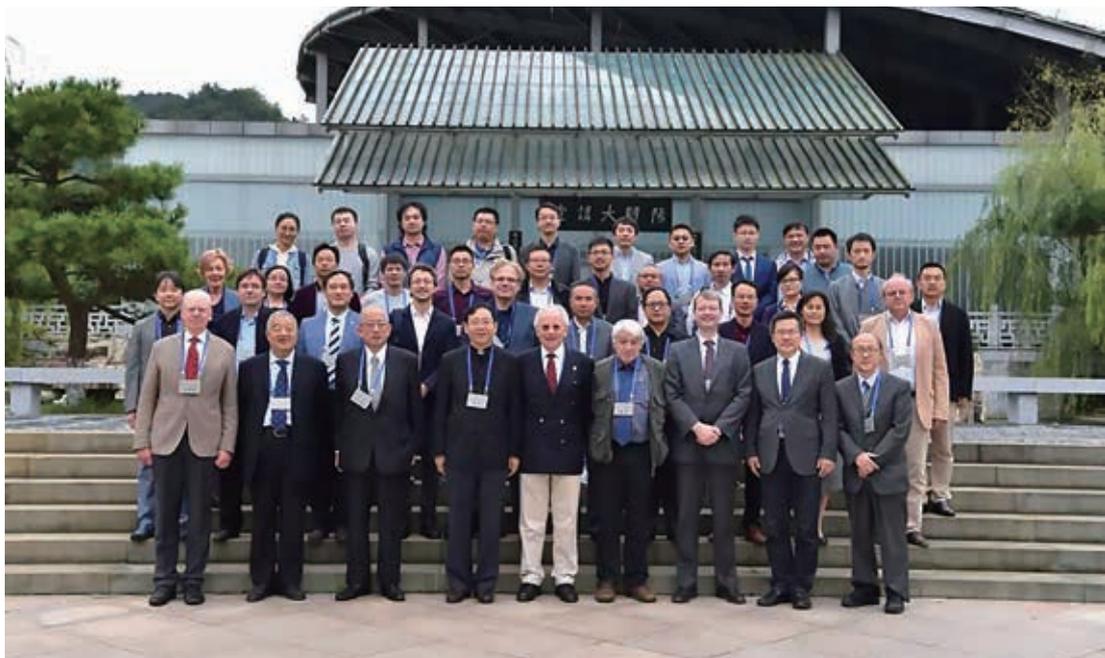
9月28日，贵阳孔学堂研修部部长肖立斌教授主持开幕式，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执行

主席徐圻教授和北外李雪涛教授分别致辞，随后举行了祭孔大典。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外历史学院特聘教授腊碧士（Alfons Labisch）和武汉大学哲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分别做主旨发言，从世界历史和比较哲学的角度探讨了轴心时代的方法论意义。

本次研讨会设立了三场对话和两场学术报告。第一场对话由李雪涛教授主持，主题为“轴心时代与世界文明”。腊碧士教授、徐圻教授、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廉亚明教授（Ralph Kauz）和北外历史学院博士后巢巍先后发言，分别探讨了轴心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华夏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

第二场对话由《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主持，主题是“我看轴心文明：追寻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北外历史学院特聘教授顾彬教授（Wolfgang Kubin）、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恒达教授、武汉大学哲学院吴根友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伦理学研究所解启扬教授分别发言，结合中国思想史的关键概念，对轴心时代的西学资源进行了探讨。

第三场对话由杨恒达教授主持，主题是“轴心时代与东亚伦理”。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的东乡和彦教授、中谷真宪教授、岑



智伟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中文与历史学院的韩子奇教授先后发言,围绕“二十一世纪轴心时代”与中日两国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对话。

除了三场对话外,此次研讨会还组织了两场学术报告,与会学者呈现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一场学术报告主题是“从轴心文明到多元现代性”,柏林夏洛蒂医科大学文树德教授(Paul Unschuld)、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杜哲士教授(Joshua Derman)、戴爱克副教授(Eric Nelson)、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院长培高德教授(Cord Eberspaecher)和北外国际关系学院巴拓识教授(David Bartosch)分别做了报告,对德国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对话与反思进行了深入研讨。

第二场学术报告的主题是“轴心时代与中国”。顾彬教授、武汉大学哲学院李健君老师、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邦金副教授、暨南大学哲学所黄燕强副教授、,贵州师范大学历史

与政治学院冉光芬教授、北外历史学院教师董成龙、杨钊与合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吴礼敬副教授先后做了报告,就本次大会的主题,结合汉语学界的问题意识,反思了轴心时代概念与现代性问题。

研讨会闭幕式由廉亚明教授主持,腊碧士教授、李雪涛教授和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周之江副主任作总结。他们一致认为本次会议是学界深入研讨西学及其在汉语学界转换生成的一次切口;时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次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华西南腹地的国故弘扬基地召开,也一定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教育所具有的实践性特质要求教师不仅拥有一定的理论知识,而且需要具备必要的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发挥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在传统的教师评价制度中,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工作常常处于与科研相互割裂的状态。教学研讨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师资培训多采取自上而下的线性知识传递方式,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展未能得到应有重视。20世纪初,发端于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教学学术思想将富有探究品性的教学和科研相等同,提升了教师在大学的学术地位。教学学术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涵具有很好的契合性,有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

一、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本质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关注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生活体验。实践性知识被定义为“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进行反思和提炼后形成的,通过自己的行动做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¹实践性知识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践探究性。实践性知识是在个体经验的积累与反复加工的基础上,通过教师个人的实际运作而形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关注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生活体验。实践性知识被定义为“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进行反思和提炼后形成的,通过自己的行动做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

成的一种独特知识。艾尔巴兹(Elbaz)认为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在各种专业实践中秉持与使用的知识,源自于课堂经验,面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得以展现。²康纳利(Connelly)和克兰迪宁(Clandinin)认为,教师通过自己的过往经验获取实践性知识,并展现在教师当下的行为和未来的体验中,³教师必须在特定领域实施任务的经验中获得这种实践性知识。

第二,批判反思性。通过理性反思,教师将经验形式化。正是凭借行动和反思性的参与,教师才能获得实践性知识,⁴也使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价值得以体现。

第三,社会建构性。教师说出个

人实践性知识中的一部分,并与他人分享,实现知识获得、积累与传承,这是实践性知识公共性特征的表现。受维果茨基(Vygotsky)相关理论的影响,学者提出实践性知识具有情境互动特征,倡导共创知识与共享经验的学习文化氛围,体现知识的社会建构的独特性。⁵在克兰迪宁和康纳利提出的教师“专业知识学习场”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场域被逐步拓展到各类场域,实践性知识在人际交互的场域里经历自发且动态的持续性发展。

教师主体、问题情境、反思与人际互动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形成实践性的认知体系,所有参与者对问题的共同探究以及对经验的总结促成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展。

二、教学学术与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的关系

20世纪初,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提出教学学术思想重新审视学术的概念,多维度的学术观彰显学术的丰富内涵。

(一)教学学术概念及其特征

博耶(Boyer)指出学术由发现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以及教学的学术共同组成。⁶其中,拓

1 陈向明:《搭建实践与理论之桥——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0页。

2 Freema Elbaz, *Teacher Thinking: A Study of Practical Knowledge*, London: Croom Helm, 1983.

3 Clandinin D. Jean, Connelly F. Michael, "Teachers' Personal Knowledge: What Counts as 'Personal' in Studies of the Personal",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987, Vol. 19, pp. 487.

4 Dewey J,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38, pp.73.

5 Lave J., *Cognition in Practice: Mind, Mathematics and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04.

6 Boyer E.,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Washington: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1990, pp.24.

展性、变革性及动态性等是比较突出的特质，强调以探究性的教学来发现、融合与应用知识，体现知识发展的动态过程。课程开发、教学设计与创新、教学方法的探究、教学反思等都是重要的内涵。舒尔曼（Shulman）将教的学术拓展为教学学术，认为教学学术应深入课堂，关注学生的学习。¹ 郝钦斯（Hutchings）指出，教与学的学术是寻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探索对待学习的新的见解与洞察，并将结果公开。² 莱斯（Rice）认为教学学术的基础在于教学法知识、教学内容知识等，它们帮助教师实现对组织教学的认识与理解。³ 舒尔曼和郝钦斯都强调学术的公开性特征，教师接受同行评价，并以多种方式在学术界与他人交流分享，揭示了教师团队开展反思和共同学习的特点。通过实践获得真知、集体反思与探究、共同体学习等都是教学学术的本质特征。

（二）教学学术与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的对接性

大学教师将学问视作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不断探究。教师在教学中展示自己对问题的独特看法与理解，这是围绕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教师与



学生的困惑而展开研究并获得知识的过程，教学与研究的融通是教学学术的重要表征，其本质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内涵具有天然契合性。

第一，教学学术立足于教学。教师通过发现教学中的问题、解析问题，改进教学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基于个人经验的建构，教师的真知产生于实践之中，⁴ 这种实践经验性的认知就是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第二，强调教与学的不可分割性。教学学术既关注教师的教，也关注学生的学，体现教师对改进教学、提高学习效果所持的愿

望。对教学问题的持续性探究是批判反思的教学过程，也是学术探究的思维过程。第三，依赖个体与他人交互的团队实践。教师共同体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主动开展多样化的学习形式，注重教师间的经验与知识共享，实现互促共进的和谐学习型组织结构。⁵ 共同体通过教师开展教学对话，组织学术性的专业合作活动，相互分享、传递与借鉴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涵盖知识、反思、交流和观念等因素的教学学术模

1 Shulman L.S., "From Minsk to Pinsk Why a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Journal of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00, Issue 1, pp.50.

2 Hutchings P, *Opening Lines: Approaches to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nlo Park, CA: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0, pp.216.

3 Riece R.E., "Towards a Broader Conception of Scholarship: the American Context", In T. Whiston, R. Geiger,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ckingham: SP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19.

4 徐萍：《高校教学学术能力的构成及其发展研究》，载《教师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第20页。

5 陈静静、姜美玲：《论教师实践性知识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载《全球教育展望》2014年第5期，第39页。

型,各种核心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教学学术能力。¹其中,知识维度考察教师对学科专业知识、教育教学知识等的掌握;反思维度考察教师反思教学实践以及学生学习的能力;交流维度考察教师与他人交流教与学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实践;观念维度考察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关注点,关系到教育目的的价值选择。教学学术模型与郝钦斯等提出的教学学术实践指导框架有异曲同工之妙,将理解和探究教学问题、重新认识和改变教学、公开以及同行共享等视作推动教学学术发展的合力。由个体的实践带动集体的批判反思学习,可以帮助教师更新与转变原有教学思维,达到实践性知识水平的持续提高。



三、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模型：教学学术的视角

在教学学术活动场域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展经历着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作为教研活动的主体,教师以个人和集体的共同发展为目标,针对教师“教什么”“如何教”等问题,以解决教学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为活动内容,在逐步走向深入的探究过程中不断发展实践性知识。研究者带着问题进入教研组,通过对教研活动的实地考察、实录,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解释性理解,获得丰富的资料,建构并发掘其中蕴含的意义,探究教学学术

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对原始资料的系统收集、分析及理论抽象,从资料中发现、发展和检验理论,并进一步阐释理论。²主要采用3种手段收集资料:一是教研组每周一次的教学学术活动,包括讨论教学中的问题、观看教学录像、交流教学反思、讨论行动方案等。自2016年9月至2017年6月,教研组共进行24次活动,每次2-2.5小时。二是教师不定期撰写的反思日志。三是对教师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研究者对资料做反复比

较、分析和概括,从中提取关键概念,再将不同概念之间建立诸多符合逻辑的联系,构建理论阐释的体系,形成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模式的核心要素。

(二) 研究对象

北京G大学是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该校大学英语部的教师是主要研究对象。作为“以老带新”项目,教研组由6位教师组成,其中2名教师是具有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4名教师是教龄3—4年不等的年轻教师,专业方向主要为应用语言学、翻译等。

(三) 研究过程与资料分析

研究者对全部活动进行观察与实

1 Trigwell K., Martin E., T. Benjamin,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 Model",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02, Vol. 2, pp.158.

2 Strauss A., J. Corbin,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0, pp.72.

录，并将录音转写为文本。根据预访谈结果，对访谈提纲做必要修订。研究者依照访谈提纲，对6位教师逐个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40—90分钟，在得到受访教师同意后进行录音。依照施特劳斯（Strauss）的三级编码操作程序，逐句分解原始资料，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第一，开放编码。检测所有原始资料，通过逐级比较，将其列入不同的类属中，从原始资料中产生初始概念，发现概念类属，尽量使用受访教师的“本土概念”作为标签。经多次整理，形成27个类属及相应的初始概念，如肚子里有“水”、开窍、醍醐灌顶等。第二，主轴编码。将开放性编码中被分离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在不同的类属间建立联系，发展并检验类属之间的关系，如因果条件——现象——情境（脉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如，多位教师谈及畅谈、切磋、手把手、抱成团、合力等类似概念，从语义和语境角度分析，意指教学学术活动中教师的交流与互动，故二级编码确定为“参与共同体”。以此类推，在编码基础上形成6个主范畴。第三，选择编码。将核心类属与其他类属联系起来，补充概念尚未发展完整的类属，形成较连贯的“整体”，且核心类属将所有结果统领在一个框架之内，确定三级理论编码。研究得出的核心类属是“教学学术活动中的获益”，围绕该核心类属，以教学学术理论为参照，形成外语教师实践

外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模型中的各环节形成合力，每个环节积极与其他环节相互作用，呈现实践性知识发展的动态性、交互性、复杂性等特征。

性知识的发展模型，其中包括5个缺一不可的环节，共同构成一个包含“发现”“参与”“分享”“实践”“反思”的动态系统，具体指发现问题、参与共同体、分享经验、实践检验与反思内化。

四、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模型的解析

外语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模型中的各环节形成合力，每个环节积极与其他环节相互作用，呈现实践性知识发展的动态性、交互性、复杂性等特征。

（一）发现问题——探究与理解的关键

学问即学会问，没有问题，也就无学问而言，更无法成为学术研究，研究是对问题的探索性解答，因此发现问题是探究的关键环节。教师需讲述自己在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难题或困惑，再经过教研组的讨论、协商和筛选，结合教师的实际需求选取教师认为当前最突出、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以问题为驱动，解决问题是知识获得的

重要途径。针对教师提出的初步问题，教研组集体探究原因，专家教师帮助教师逐层剖析，最终确定研究的关键问题。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问题能激发教研组成员的兴趣和热情，同时问题能反映出教学的一般规律。教研组一起观看教学录像，每位教师从不同视角深层次挖掘教学的根源性问题，对问题的探寻呈现多视角的链状衔接机制。在此基础上专家教师提出更深入的问题，如：“课堂提问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学生有什么焦虑？”“教师做了什么？”“还应该再做什么来改善？”可能教师一时间给不出答案，但这些问题成为探究过程的“导火线”，引领教师进一步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及教师角色等角度审视教学。这些问题具有转折性意义，引领教师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开启集体反思探究的学习之旅。教师以课堂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为契机，在集体讨论中坦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角度地质疑与分析，重新认识教学中的不足，不断突破自身认知的局限。

教师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的过程受到教师知识结构的影响，关系到对“教什么”“如何教”等问题的理解，具体体现于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认知与感悟等。虽然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并不是盲目地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多角度的探究，拓展审视问题和理解教学的视角。对知识的持续探究使教师对教学问题的理解逐步深入，

最终获得一种新的实践性认知。

(二) 参与共同体——经验获取的重要条件

教研顾名思义教学研究，即为教学学术。教师带着自己对教学问题的理解走进教研组，把同事作为顾问、借鉴或批判性伙伴，与他人进行批判性对话，真切地了解他人的观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更清楚地认识隐藏在教学行为背后的理念。教研组在教学发展中发挥“脚手架”的作用，其活动形式本质是一种实践共同体，具有共同的目标、教师间相互的关注、对实践投入、共享“经验库”。参加教研组活动不单是为了讨论教学，教师超越实践层面的限制，从理论上解析问题，教师得到的不只是别人的经验，重要的是“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认知互动是促进教师参与的重要途径，教师在集体研讨中展现自己的经验，与他人开展深入的对话，这是一个通过模仿、妥协、辩论与重建等方式参与协商的过程，通过共同体协商的知识将得到认同与强化，体现了具有复杂性和“再生产性”特征的知识发展过程。

教师知识的获得既以个体经验为依托，也受共同体经验的影响。共同体中蕴含集体的智慧，个体教师所呈现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知识存在于人际互动中，共同体的知识在动态地流动与生成。教师也会通过“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库，并逐

教研顾名思义教学研究，即为教学学术。教师带着自己对教学问题的理解走进教研组，把同事作为顾问、借鉴或批判性伙伴，与他人进行批判性对话，真切地了解他人的观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更清楚地认识隐藏在教学行为背后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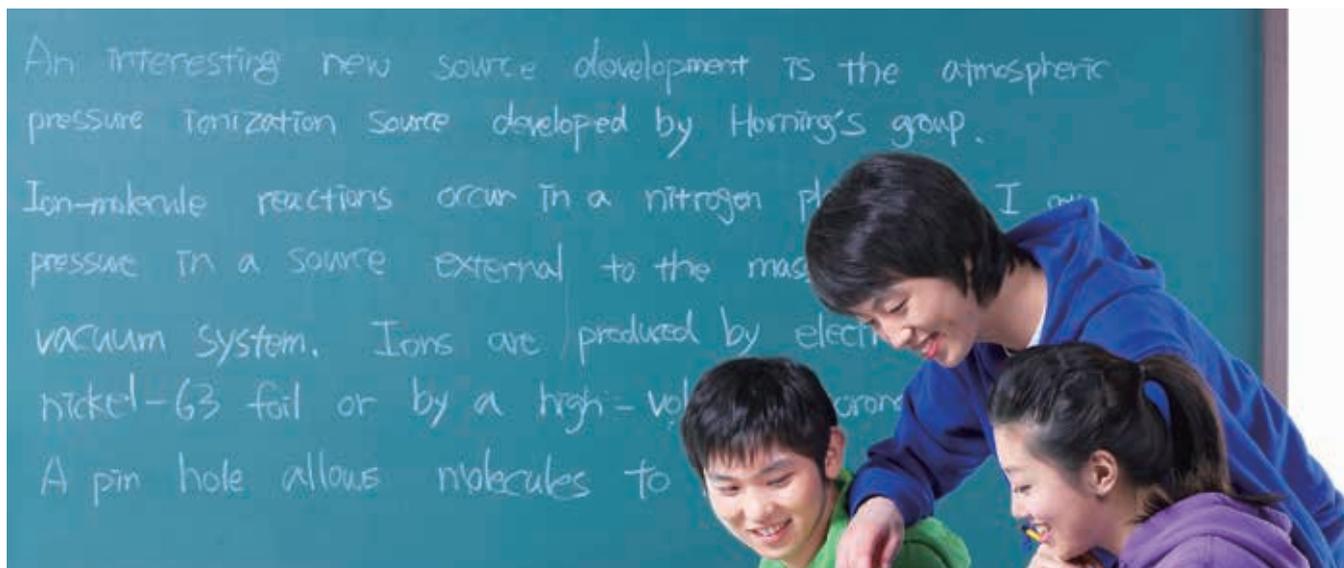
步同化所获得的新知识。当他人的知识与经验通过情境反馈确证其合理性，就会在教师的实践中内化与活化，最终内化为教师个人的实践性知识，成为个人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专家教师的丰富经验和“手把手”扶持，使年轻教师更快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不再“摸着石头过河”。在教研组的“场域”中，教师通过共同体的对话交往，可以探寻自己观点、行为及教学成果的社会意义，进而获得认可，激发教师参与共同体学习的动力。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的学习方式赋予教师多样化的参与方式，在平等探究的氛围中教师相互砥砺，集体的灵感得以释放，充分体现教学学术活动的价值和意义。

(三) 分享经验——知识内化的催化剂

知识和经验往往以个体知识、隐性知识的形式内置于教师的日常经验，

教师通过与具有类似经验的教师共同进行批判性反思，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教学学术鼓励每一位参与教师提出问题，引导教师将讨论迁移到自己的问题情境中，激活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一些受访教师感言“团队的经验分享、深刻的分析就像是催化剂”，促使教师找到问题的症结，制订出行之有效的教学行动方案。教师与他人建立彼此支持和交互的同伴关系，在经验公开化的过程中，教师个体所积累的知识将成为被其他教师理解和使用的公共知识，同时整合分布于共同体中的知识，使之成为个人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体现教学学术所具有的知识分享与增值的核心价值。

除了口头讨论，教师还通过文献阅读、反思报告、论文写作等交互循环的方式参与探究学习。教师的共同阅读为讨论提供资源，讨论开启了教师批判反思的探究功能，而写作可以帮助教师提高对知识的认识水平。通过撰写个人反思日记，教师可以随时将自己参加教研实践的所感和所想真实地记录下来，在与他人分享的同时，倾听不同的反馈，使之转化为有价值的实践性指导。教研组活动提供了一个平等互助的平台，教师互相听课、观摩教学录像、读文献、写感想，定期交流心得体会。开放式讨论、批判性对话、集体性反思等活动围绕教研组的共同目标展开。专家教师平等地对待新手，积极响应教师内心的学习诉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同事之



间放下习惯性的防御，坦诚地交流与合作，形成开放自由的教学学术探究氛围。在深入问题探究的基础上，逐步积淀成教学学术成果，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成果形式公开化，反映教师对教学内在问题的理解。教师实践性知识得到积累，在集体研讨中分享彼此成果，实现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的融会贯通。

教师通过对话等方式与共同体其他成员产生观点的互动、思想的碰撞，实现教学信念的交融，也为自身学术研究提供帮助。每个教师都在为共同体的建设贡献智慧，如果教师的创造力能够得到集体的认可与接纳，他们贡献的资源不仅可以成为一种共识，而且会进一步强化每一位教师的个人实践性知识。

（四）实践检验——知识获得的基本途径

以教学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将得到不断的改善，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经实践检验的理论，会更准确、更客观地反映教学实践的规律。在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实践和理论将同步优化，达到“实践出真知”的目标。经集体认可的合法化的知识要在实践中通过知识的证明而变成教师个体的知识，特定的教学情境和实践中的建构是实践性知识生成与完善的必要条件。¹在教学学术活动中，教师既讲述自己经历的问题情境，也分享他人的经验，之后再将这些“经验库”中的知识迁移到新的问题情境中，直面问题。在集体研讨中教师获得的知识是公共性的，必须由教师将这种知识应

用于实践并得到确证，通过教师自身的行动“做出来”并使之不断得到检验、证明，实现同化与顺应，丰富自己的“经验库”。通过教学学术活动前后的课堂教学实践，教师体验改进教学行动的实际效果，验证自己新生成的不确定的知识，不断发展自己的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对教学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会引发各种积极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以各种可视化的教学行为显现出来。

教师经历“适应”“修正”“摒弃”或“重构”的实践过程，不断改进自身对教学的理解，在行动上成为积极投入教学的实践者，对教学的体认也在同实践情境的互动中得以建构。通过不断重复的知识结构重组与学习、再认识与再创造，逐渐形成知识的升

1 林军：《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路径探析》，载《教育评论》2015年第4期，第69页。



华和智慧的积淀，本质上是一种教师学习的发展过程。这恰恰符合“最近发展区”理论，教师已有经验体现着教师的现有水平，客观地反映在教学中，但如果教师能够在原有知识与经验基础上再往上“跳一跳”，就会获得“经验库”中最近发展区内的知识和经验。当教师确认这些知识解决了实践中的问题，并能在以后的教学中经常调试与使用，这种经证明的合法化的知识将进一步成为教师个体的实践性知识。

（五）反思内化——知识发展的主线和推动力

实践性知识以经验为主要内容，但绝非经验本身，它是通过教师的理性反思而逐步形式化的结果。若教师只停留于经验层面，不对自己的经验与实践进行反思与有效整合，那么经

验的增加并不必然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展或增值。“行动”的执行和“反思”的参与构成实践性知识获取的两个必要条件，反思教学实践经验是促进实践性知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内省式反思过程中，通过觉察、矫正的方式，教师开展自我对话与自我批判，思考“我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哪些行为最恰当”等问题，这些关键性事件引发教师的内省式反思。同时，教师依托专家与同事的帮助开展外援式反思，更深入地理解问题。不论是行动前反思、行动中反思，亦或行动后反思，都是教师超越个人经验表面因素的思考，在完善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建构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归纳成功经验，进而反哺教学实践。受访教师认为自己对教学理念的思考经历了持续发展的阶段，从自我意识、

学生意识到教育意识，思考的主线一直围绕课堂教学的核心问题，集体的反思对话、质疑、冲突、批判和解惑让教师不断成长。教师将自身可喜的变化归功于教研组的集体反思，在教学取得成效之后，教师再将自己的感受反馈给教研组，带动团队教学学术的开展。

教学学术赋予教师研究者的角色，教师要研究自身的实践经验，而反思正是教师研究自身实践经验的基本途径。教学学术为教师个人和集体进行反思提供了条件和资源，使教师从根源上更新自己固有观念，重新建构自身关于教学、教师和学生的知识。对教学的持续关注是教师反思的源动力，它以教师对优秀教学的追求为前提。教师深入反思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将思考付诸改进教学的行为中。教师应成为具有学习能力的“反思性实践者”，反思不仅是教师教学学术的目标，而且应成为教师学习的重要职业品性。

基于教学学术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模式充分体现了互动性与持续发展的特征。教学学术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展提供了资源，教师通过发现问题、参与共同体、分享经验、实践检验、反思内化的循环发展过程，实现实践性知识的持续更新。教师借助教研组的专家引领，通过教学学术促进默会知识的显性化，实现实践性知识的优化与发展。



《西游记》在泰国的传播、再现与衍生¹

【泰】谢玉冰 (Charassri Jiraphas) /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摘要

一位僧人与三个护卫——石猴、土怪（猪）和水怪往西天取经的故事题材，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就以闽南语音译“Sai-you”之名在泰国普遍流传。通常来说，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对泰国的影响最为广泛，《西游记》应该排行第二。不过，从传播和影响的独特性来看，《三国演义》却没有《西游记》故事在泰国传播得更“淳朴地道”。《西游记》在泰国的传播途径除了泰译本、改写本及连环画本以外，中国（包括香港地区）、日本各版本影视作品只要一公映，也很快能在泰国看到泰语版本。泰国庙宇里的《西游》图画故事不算非常普遍，但也不能说稀少。尤其让人惊奇的是《西游》故事里的虚拟人物——齐天大圣在泰国以鲜活的形象深深扎根。在中国已有的崇拜“大圣爷”的情形，在泰国香火更旺。《西游记》在泰国人的理念中，从阅读、视听、信仰及艺术欣赏等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其影子。该经典文学作品在泰国流传与接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各种传播方式中呈现出被泰国社会容纳并打上当地烙印的特点。

关键词

《西游记》 泰国传播 乃鼎《西游》(Sai-you) 泰语版《西游》影视 孙悟空崇拜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西游记》在泰国的传播、再现与衍生”的研究成果。

关于《西游记》在泰国的传播，笔者曾于1995年撰写名为《〈西游记〉在泰国的研究》¹的硕士论文，从那时就开始考察、搜集及研究。2013至2017年按照原先掌握和研究的线索，再次补充和整理。从19世纪末至今该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在泰国的几条线索不断发展与衍生，其中主要有三大传播途径：文本、影视、信仰。或从欣赏故事的知觉（感觉）角度归类，可分为阅读、视听与心触。《西游记》能让泰国人从不同角度接受，既是种“异而鲜”，又是种“鲜而异”的情形。玄奥奇异故事情节使大众不断地把它在不同媒介里一再重现，同时，在不同媒介广泛地传播过程中有它特殊的再现和衍生的一面。影响泰国社会的三条途径各有显著奇特之处，值得探索研究。

一、文本的传播

1. 三种泰译“范本”

1) 最早发行的乃鼎译本——《西游》(Sai-you)

在19世纪末泰国已有《西游记》泰语版本。起初的译本以闽南语发音译为《Sai-you》(西游 ไชยิว)，由当时的私立出版公司索蓬披帕塔纳功(โสภณพิพรรฒธนากร)请泰国华人乃鼎(นายติน)翻译并出版。乃鼎泰译《西游》在泰国传播时间很长，自从发行以后，在一个世纪中一直没有其他完

从19世纪末至今该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在泰国的几条线索不断发展与衍生，其中主要有三大传播途径：文本、影视、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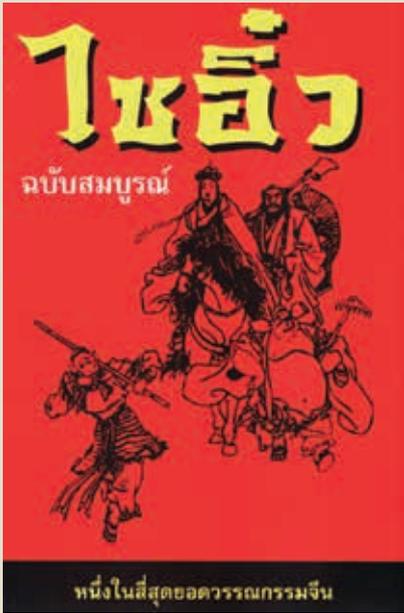
整的译本出现。由于中国古典文学自曼谷王朝开国以来一直深受泰国的重视，“中国学”在泰国群众基础广、影响范围大，一直以来当局都在支持与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这使乃鼎泰译《西游》不断地再版。自19世纪末首次发行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正式再版的版次就有好几个。20世纪初的再版是1907—1910年，由原来的出版公司索蓬披帕塔纳功每年出版一册，全书分四册。时隔将近60年后，1969年泰国教育部的部属单位库陆撒巴出版社(องค์การคำคุณฐภา)将曾经译成泰语的35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统一整理、润饰并再次发行，乃鼎的《西游》也被列为其中之一。库陆撒巴版的《西游》共分为八册，每册书前有介绍故事中人物的图片。库陆撒巴出版社出的《西游》泰译版也就是乃鼎译的版本，是泰国流传最久、最有价值，最值得保存的版本(图1)。在该版本快绝版的时候，21世纪又有几家私立出版公司将它重印再次出版。先是2004年习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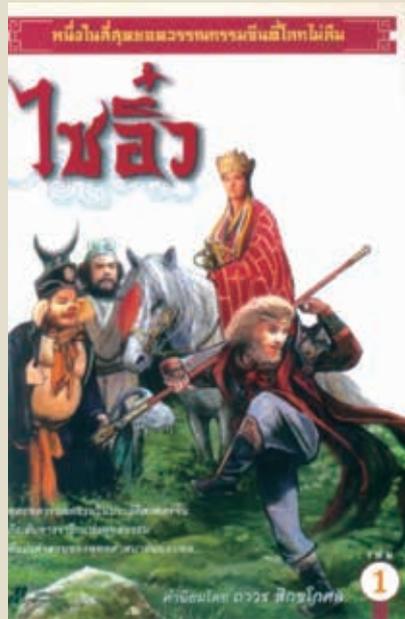
【图1】库陆撒巴版的《西游》的封面与扉页

雅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ศรีปัญญา)和柯西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โพธิ์) (图2)同年先后发行的版本，接着是2009年尚珊图书出版公司(บริษัท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บุ๊คส์ จำกัด) (图3)出版发行的版本。

1 【泰】谢玉冰(จรัสศรี จิรภาส):《〈西游记〉在泰国的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95年。



【图2】柯西出版社版本《西游》的封面



【图3】尚珊图书公司版本《西游》的封面

乃鼎《西游》在翻译上有减、改、增、并、缩等译法，其中韵文部分大都被删减，仅保留一些与故事情节结合紧密而不能删掉的部分，使用“简述”或“简编”的译法处理。另外，还重新排列了故事内容，即将百回内容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孙悟空出生与大闹天宫至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内容（原文第1—7回）；第二部分讲述唐三藏取经缘由（唐太宗入冥以及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原因），也就是原文第8—12回；第三部分才照原文第13—100回展开，也就是唐三藏和三个徒弟去西天取经的蒙难过程直至取经的结局。乃鼎《西游》在翻译的文笔上不太重用泰语的惯用词与标准

句型，通常书面和口头语混合泛用，还完全使用泰国人不熟悉的闽南语音译专有名词，在发现有些词语不好解释时，有时直接音译或跨越整段内容。除此之外，因为泰语不常用标点符号，要靠不同标准的空格理解句子的意义，老版本的《西游》却经常出现空格不当，给读者带来阅读不顺畅的问题。不过，目前流行的习班雅出版社、柯西出版社及尚珊图书公司版本纠正了这些问题，并把库陆撒巴版八册融合一起精编并分成两册发行，译文与最早发行的版本几乎没有改变，只是有的保留了原有图片，有的没有保留。现代印刷技术和彩色封面设计的烘托，提高了该译文的价值，对吸引读者的阅读

兴趣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乃鼎泰译《西游》版本不断地在不同时代再版、重生，且多数普通读者对该译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原因有几点：

一、可能是高温气候和小虫干扰的成长环境使多数泰国人没有养成耐心阅读长篇图书的好习惯，不过，对中国古典文学译本感兴趣的读者来说，反而特别看重它们的生存。中国古典文学早先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召集和组织宫廷里的中泰学者和翻译家将多种作品译成泰文，并开始流行，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成为一种传统，慢慢地变成早期泰国印刷品如图书和报纸的主流题材。从最开始的宫廷任务，逐渐演变成私人图书机构自愿承担。其实，出版是种行业，应该讲究效益，不过据考察，无论哪次出版中国古典文学泰译版本，不管是国家或私人出版机构，都不完全考虑经费的问题，每次出版量最多也不会超过2000套，且销售时间很长。书中前言或绪论里表明，保持古书的寿命是不少出版公司的一条准则，另外，也是为了新一代读者能有机会阅读和欣赏价值高的译作。这种保留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流传的初衷一直以来都是一种传统。

二、早期（1898年）或晚期（20—21世纪间）发行的乃鼎《西游》译本，往往也保留一个好传统，通常出版公司会在书前介绍成书原因或出版印刷该套书的来龙去脉。《西游》库陆撒巴

版介绍了总汇 35 种中国古典文学泰译版的缘由并介绍各种古典文学作品在泰国的发行时间。晚期发行的版本如尚珊图书出版公司版增加了泰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西游记》的相关研究,如唐僧在中国历史和佛教中的地位及功劳、《西游记》在中国现当代社会中的理解程度和对中国小说的影响等,也介绍了《西游记》在泰国流传的几个版本。书中也把早期库陆撒巴版总汇中国古典小说在泰国的流传版本情形做了介绍。这两点已证明泰国读者对《西游记》不仅是表层的欣赏与学习,其兴趣也扩展到专业学术层面,专家以泰国观点进行分析和评论,使该文学作品在泰国的流传拓展到一定深度。

2) 寿·博达普墨盎译本——《西游记——向西天取经》

除了乃鼎《西游》外,1960 年出现了寿·博达普墨盎(ส.ประดับบุญเมือง)译本:《西游记——向西天取经》(ไซอิ๋วก็ จารึกสุรามพุทวิปเบียงตะวันตก),由《材雅铺》(วารสารชัยพฤกษ์)月刊刊载。仔细看来,该译本也是有价值的泰译本。从翻译文笔看,译者寿·博达普墨盎主要把翻译精力投入到如何能让泰国人理解各段故事情节,还要理解《西游记》中出现的文化、历史、宗教哲学观点及背景等细节。对原文出现的专有名词虽与乃鼎一样用方言音译,不过通常还用括号直译原词。在翻译的诗体部分,一方面用方言音译,同时用括弧保留中文原文,另一方面再用泰文解释,全诗译完又有全诗意义



【图 4】21 世纪新出泰译版《西游记》

的总结。有些专有名词若能与印度梵文和巴利文对比,就照用泰国人熟悉的梵文和巴利文翻译和解释,甚至在解释的时候有时还使用英语。有时为解释故事中的某种事物或人物,几乎花一两页进行说明。该版本穿插与乃鼎版本不同的图片。因为用词讲究,文笔顺畅,按连载方式发行,每段结尾都有吸引读者再续读下一段的情节,可惜该版本流传不甚广泛,知道的人非常少。最让人失望的一点就是第一次刊载的前言中明明介绍说,该版本的全文曾经出版过一次,而《材雅铺》出版公司——泰瓦他那帕逆(ไทยวัฒนาพานิช)只刊载第 1—11 回就停止了,原因不明,从来没有人发现寿·博达普墨盎全译文。在《材雅铺》仅刊载仅 11 回的《西游记——向西天

取经》泰译本原在泰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目前已经不全。

3) 威瓦·帕查隆威译本——21 世纪新出泰译版《西游记》(图 4)

早期的乃鼎泰译《西游》独自传播时间长(超过百年),影响了其他各种版本,同时也使人们一直沿用该版本所音译的专有名词,可以说泰国读者已习惯《西游记》故事闽南语的人物、地名。时间推进一百多年,早期移民泰国的华人已慢慢地融入泰国社会,精通中国语言文化者越来越少。泰国“华人文化”正在处于生存危机中。当人们已对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中难度较大的《西游记》快绝望时,2016 年 3 月,泰国的一个佛教宣传机构玛玛撒巴部署的出版公司(บริษัทธรรมสภา บันลือธรรม)将威瓦·帕查隆威(วิวัฒน์ ประชาเรืองวิทย์,

现今已 80 来岁) 最新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作《西游记》印行出版。这位老先生对于传播中国古典文学贡献很大,《西游记》新泰译版本出炉之前,他曾经翻译过《三国演义》、《列国志》、《西汉演义》、《封神演义》、《红楼梦》等。

笔者因为 2017 年刚拿到该版本,尚未深入研究,粗略翻阅并与原文对比后总结了该译本的特点:一、该译本应该算是目前泰国最详细且完整的百回版本。译者将百回《西游记》几乎每句都翻译出来。二、19 至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大都不会翻译诗体,该版本却将所出现的诗体一一译出,并按原文风格,每一诗体大都齐行排列。三、按照翻译方法评论,可看出该版本是传统译法,即译者尽可能保持原文风格,一句一句翻译,常常没有忠实泰语语法,反而特别重视与原文词句排列对等地翻译。四、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除了重要人物沿用乃鼎译本的音译,威瓦·帕查隆威将专有名词用普通话的发音予以翻译。

该套译本命名较长,把“西”、“游”和“记”三个字个字意义区分并排列翻译成为“ไซอิ๋ว บันทึกทัศนาวจรชมพูทวีป”。全书共四册,100 回《西游记》中,第一册(1—25 回)、第二册(26—50 回)、第三册(51—75 回)、第 4 册(76—100 回)。因泰国印刷行业不景气,该译本第一版的印刷量才一千套,目前一般书店难买到。

2.《西游记》泰译本衍生品,反映泰国社会文化的代表文本

虽说乃鼎《西游记》在翻译上不完全忠实原文,不过百回故事主要题材也都保留了,在 21 世纪新版《西游记》出现之前,长期以来一直是唯一的《西游记》泰译全译本。

虽说乃鼎《西游记》在翻译上不完全忠实原文,不过百回故事主要题材也都保留了,在 21 世纪新版《西游记》出现之前,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唯一的《西游记》泰译全译本。除了以上介绍的三个重要版本外,笔者还发现了其他相关版本,较特殊的是开玛南达《西游记——远途之旅》和傍譬《西游记》。笔者的硕士论文《〈西游记〉在泰国的研究》曾经把这两种归纳为节译本和选译本,因为当初研究时把各种作品与百回原文大略对比而忽略了它们的写作背景。这几年重新审视,同时再次询问相关人士,最终可认定,这两套作品是受乃鼎《西游记》或泰国传统译本的启发和影响,并不是直接照中文版本翻译,或者说它们不是“翻译型”而是“改编型”的版本。如果确认《西游记——远途之旅》和傍譬的《西游记》是依原有泰译版脱壳而来,那么可以肯定《西游记》书面传播已经给泰国读者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两套作品是《西游记》泰译版在泰国衍生的代表作,同时恰

好体现和反映了泰国的文化和社会观。

1) 反映泰国社会文化观的傍譬《西游记》

傍譬(พ.บางพลี)《西游记》由欧典(Odian)出版公司于 1968 年出版。此套书分为两册,内有泰国画家绘制的 15 幅故事插图。该版本完全以泰国人讲故事的方式编写,主要的专有名词依据乃鼎《西游记》的音译法。与原文百回对照发现,此版本选择了 100 回的内容重新编排成 84 节,其中省略的部分有:第 33—35 回、第 43 回、第 55 回、第 62—67 回、第 80—86 回以及第 91—92 回。在分合情节上,有的把原文一回分成了 1—6 节,有的把原文 1—6 回缩成一节。从总体情节可以明显看出,几个故事人物中,作者更突出猪八戒的情节,尤其把猪八戒描写成好色之徒来讽刺泰国社会有些男性的行为。该书擅用泰国口语描写三个兄弟之间的对话,用词通俗、简洁、地道,风格诙谐有趣,使读者感到如同正在听泰国人讲泰国的故事一般。可以说该版本经过改编后完全脱离原文的风格并创造出本地化的新作品。傍譬《西游记》版本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发行,泰国很少人知道此版本,它的传播范围也不广泛,目前只保存在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图书馆,其他重要图书馆没有出现。该版本之所以没有那么多受欢迎,到底是因为改编幅度过大,把《西游记》的原有价值颠覆了,还是因为更换主配角的地位,或者因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泰国的传播形

式主要是较为规范、典雅的类型，将有关佛教的故事改编成猪八戒的好色所以影响了它的传播，该问题有待单独思考、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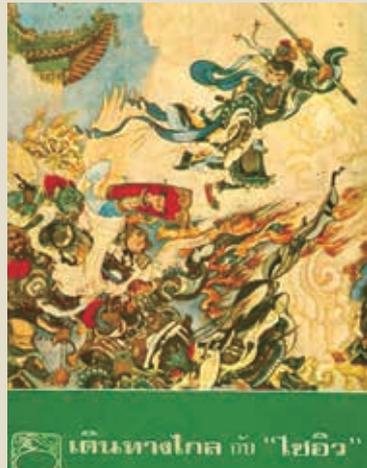
2)反映泰国宗教观的开玛南达《西游记——远途之旅》

另一《西游记》故事的改写本是《西游记——远途之旅》(เดินทางไกลกับ“ไซอิ๋ว”)，与傍譬《西游》写作风格不同。它们一本是写人间表层，一本是写人间里层。《西游记》故事在流传起点是以儒为根本，道为内容，佛为形式的故事，一到流传终点——文化背景是虔诚信仰佛教的接受者泰国，“三教合一”自然而然被泰国佛教徒“佛教化”。泰国是佛教信仰虔诚甚旺之地，泰国人不必经常到寺庙或每天念佛经，仅在居所里供奉佛位，摆几本佛经，也都认为也会阖家幸福、人人安详平和。当《西游记》传入泰国，不少泰国佛教徒也认为《西游记》是一部佛教小说，不关注它的故事而关注它含有的佛法奥妙，同时他们还崇拜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佛教徒——唐僧为学佛取经万里行，有关唐僧的来历及他取经后对“解经”、“译经”和“传经”的贡献，在泰国图书馆或书店都能找到这类书。

1974年泰国克里泰出版公司(บริษัทเคล็ดไทย)出版了一本《西游记——远途之旅》(由“实习和实行佛法基金会”กองทุนวุฒิชัยธรรมเพื่อการศึกษาและปฏิบัติธรรม印行)(图5)，书中将《西游记》故事演绎得超脱人间，故事中的每个重要情节所描绘的每一题材、每一细节，

另一以《西游记》题材作为改写本的《西游记——远途之旅》(เดินทางไกลกับ“ไซอิ๋ว”)，确实与傍譬《西游》写作风格处于两个极端。一本是写人间表层，一本是写人间里层。

包括人名、神怪名、地名以及各种物品名(如食品、武器等)，还包括故事人物的种种行为，被一节一节穿梭为一条需要一一解开(解答)的“谜语”，而这些谜语全以佛教观点如何看待人间常情来揭破(解析)。该版本的每一章的前头，编者先概述故事情节，然后补一段对话，由“具体”(รูป)和“抽象”(นาม)两个徒弟引话对答，而由“我”(โหวง)(作为看透人间者)解答谜语。书后面还把故事中发现的谜语整编成小辞典。这样机智、深奥的话语成品，当然不是普通百姓能随便编成。这个版本确实是位法名叫开玛南达(เขมานันทะ)的僧人所编。该版本刚开始时，仅在小范围读者圈内流传，后来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广。自从1974年发行以后，该书就陆续再版近十五次。1987和1988年在不同出版公司出版时，仍沿用原名——《西游记——远途之旅》，1997年版封面题名改为《西游——智慧猿猴》(ไซอิ๋ว ลิงจอมใจ)(由批牟刊出版社 สำนักพิมพ์ พิมพ์คำ 出版)。



【图5】《西游记——远途之旅》老版本的封面



【图6】比雅达·瓦那南的《西游》故事

书中几乎每一章都附有插图，以表现该章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多次发行中有几次没有署名，只保留发行者即某些泰国佛教机构的名称。除了开玛南达《西游记——远途之旅》和《西游——



智慧猿猴》之外，2007年又出现从佛教观点解析的版本叫《西游——佛境界旅途》(*ไซอิ๋ว ฉบับเดินทางสู่พุทธภาวะ*)，由名叫禅·翁撒达亚农 (*ชาญ วงศ์สัตยมนตรี*) 的编者编成。该版本应该是对开玛南达版本的再梳理，故事梗概和图片大都与开玛南达版一致，只不过摒弃了师徒问答的编写形式。

泰国人对《三国演义》有个流行说法是“读三篇《三国》的人不能交流”，意思是说《三国》的内涵并不在于简单的娱乐，而是本万能智慧书，尤其在如何用人、经商谋略等方面，读的越深，人就越聪明直至旁人不能交往。笔者认为对《西游记》的泰国读者应该有这样的说法：“光读三遍乃鼎《西游》，还不甚明了，读一遍乃鼎《西游》再读三遍开玛南达的《西游记——远途之旅》

者，甚能交流。”开玛南达是从泰国佛教的角度来解读《西游记》的编译者和研究者，甚至是唯一对《西游记》做深入研究的泰国人。他的编写和研究使得《西游记》在泰国不再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

3. 推动泰国读者熟悉《西游记》的浓缩本——《〈西游〉故事》

在出版的几本泰语版《西游记》中，最为浓缩的版本是《〈西游〉故事》(*เล่าเรื่องไซอิ๋ว*)，(图6)由苏威力亚珊出版社 (*สำนักพิมพ์สุวิทย์สาธิต*) 印行，儿童社团 (*ชมรมเด็ก*) 组织出版。1987年和1997年该书由同一社团出版过两次。编者是泰国儿童文学女作者比雅达·瓦那南 (*ปิยะดา วนันท์*)。比雅达从百回《西游记》中挑出数十回组合成18节内容，她取的泰文分题名 (译成中文后) 依

次是：西游记的来历、唐三藏、行者、如来佛的旨意、向西天取经、人参果、黄袍奎星、乌鸡国、西梁孀妇、祭塞国、朱紫国、比丘国、女妖天神的女子、凤仙郡、假佛、冠大宽富翁、到西天、最后羯磨。书中还从中国内地、香港出版过的不同连环图画版中采用了不少插图 (合计13张)：唐三藏、猴悟空、猪悟能、沙悟净、行者战白骨精、行者打白骨精、行者飞天行、唐僧和三徒弟向西天、恭拜假如来、妖精化为母女瞎骗唐僧等。比雅达以作者自己给众人讲故事的写作风格简单介绍故事，文笔简单易懂，选题和配图内容前后联系紧密。泰国读者不但从中粗略地了解整个故事梗概，还可以从该版本找到儿童幻想故事的乐趣。

4. 儿童版本《西游记》

连环图画本或儿童版本形式泰语版《西游记》的出版传播高峰是20世纪末直至当代。该传播方式较早是由泰国唐人街耀华力路上一家专门推广中国文化书籍的南美公司推行，当时南美公司 (*บริษัทนานมี จำกัด*) 出版的几套《西游记》连环画有的是直接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引进，也有的是公司请人译成泰文的。南美出版公司发行的《西游记》系列最早是由代理商方式发行，其中一种是1986年香港海峰出版社出版的《西游——美猴王专集》(*หนังสือชุดมียเกาต้อง*)。(图7)该版本是彩色连环画，原书共有34册，但是被选译和出版的有17册：“行者”出世、“行者”大闹天宫、“行者”归

正、大闹黑风山、猪八戒做女婿、流沙河收沙僧、偷吃人参果、巧斗黄袍怪、莲花洞、智降狮狒王、勇抢红孩儿、变法斗三仙、大战通天河、勇斗青牛精、真假悟空、劝善施雨及取回真经。每册的改编者和绘画者大都不是一人，且未记录译者。翻译文笔依照原文风格，用词简单明了，不过因为价钱高昂，所以流行不甚广泛。

另一种是波·摆迈 (บ.ใบไม้) 翻译的《西游》，原版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罗浪编写。泰国南美公司引进发行。中国原版共 40 册，选译 32 册，其中没选译的 8 册有：唐僧出世（第 3 册）、惩猪八戒（第 10 册）、黑水山（第 17 册）、解阳山（第 21 册）、驼罗庄（第 27 册）、灭法国（第 33 册）、凤仙郡（第 25 册）及灵山除寇（第 39 册）。书中每册配多幅黑白图画。该版连环画共出版过两次，第一版在 1962 年前后，第二版的封底仅记录了册数（32 册）和该册的题目，而没有记录确切的出版时间。除了泰译本连环画以外，同时还引进香港原版的英文连环画本“*Monkey Subdues The White-Bone Demon*”，由徐光炯 (Hsu Kwang-jung) 和潘载英 (Pan Tsai-Ying) 改写，张弘攢 (Chang Hung-tsan) 绘画。上世纪末其他出版社如阴阳出版社也在 1989 年开始引进台湾出版的《西游记三十八变》（台湾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由台湾

汉译泰的图画本在 21 世纪初 (2004 年以来) 特别盛行，几乎每年都连续发行一本不同的《西游》绘画版。

著名漫画家蔡志忠绘画。此书由泰国人丘迪才 (โชติชัย) 与卡内 (คณศ) 翻译，全书共分为两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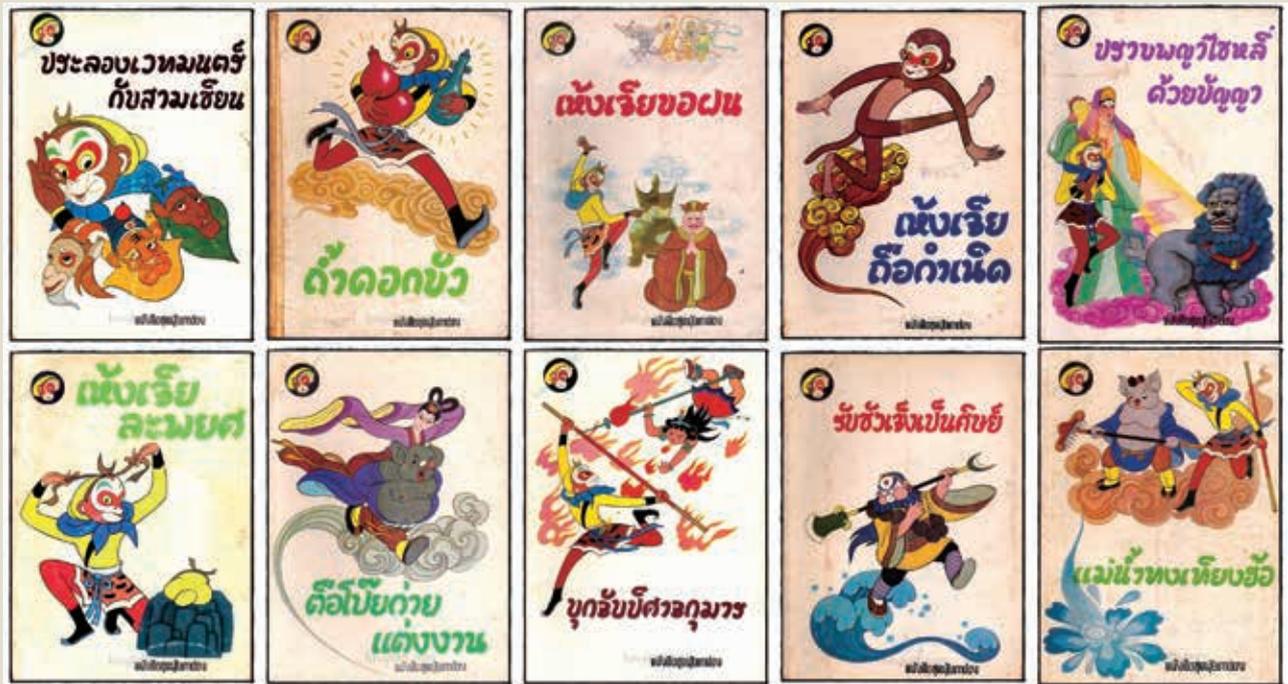
南美公司是华人创办的公司，早年是泰国推广中国文化图书的最大支持者，不过，在更换了经理后，便转向翻译西方图书。随着时代的变化，20 世纪末汉语热兴起，推广中文书的公司越来越多，中、泰合作经营的汉语图书公司也增多，但是大都以发行汉语教学书籍为主。这时日本公司纪伊国屋在曼谷市中心也开设了书店，大量引进东亚图书和一些西文书籍，除了日本外，还有中国内地、中国港台地区和新加坡书籍。其中《西游记》的中、英文版本也引进了很多，但没有专门发行《西游记》的泰译本。这家书店的主要传播对象其实是居住在泰国的外国人，在传播中国文学经典上并没有达到语言文化的互动。该书店与南美公司对《西游记》

的推广差别就是，尽管是在泰国出现，并不能说是在泰国当地传播语言文化，所以不是泰国传播《西游记》的重要途径。

汉译泰的图画本在 21 世纪初 (2004 年以来) 特别盛行，几乎每年都发行一本不同的《西游》绘画版。¹ 由南美公司出版的有《西游记绘画版》(甘亚拉 กัญญาวัฒน์ จิราสวัสดิ์ 译者翻译)、《西游》(诗拉威 สิทธิวัฒน์ วิศิษฐวานิชย์ 和塔尼塔 ธนินฐา ไสระสิงห์ 翻译，全书共 20 册) 等。其他已发行的泰译版本还有 2009 年雅典图书 (Athen Books) 出版的《西游》、2012 年曼谷安马林连环图书出版公司 (Amarin Comics) 的《西游》(全书共四册)、曼谷图书公司 (Bangkok Books) 出版的《西游——西天神奇》(โชติว มหัทศจรรย์แห่งชมพูทวีป) (全书共三册) 和 2013 年民族教育娱乐 (Nation Edutainment) 公司出版的《Go Go Go 西游》(全书共七册) 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版界重视版权的时代，泰国大小、新旧出版公司从 2006 年开始创作自己的《西游记》图画书，即由泰国画家和儿童作家自己编写《西游记》连环图画本。如 2006 年就有两家出版公司编辑两种《西游》连环图画版，即天空图书 (Sky Books) 出版公司和暹罗国际多媒体 (Siam Inter Multimedia) 出版公司。紧接着第二年 (2007 年)，塔卡尼

1 温英英在硕士论文中曾收集整理 21 世纪后泰文版的《西游记》图画本，发现在 2004—2013 年间共出现 21 种。【泰】温英英 (หนัยรัตน์ อุดมลาภธรรม): 《〈西游记〉泰译本的变异研究——以鼎译本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4 年，第 24—25 页。



【图7】《西游——美猴王专集》泰译版

(Thatkanit) 出版社也出版了九册一套的《西游》，随后的2010年暹罗国际多媒体出版公司也出版了六册一套的《猴王——西游》(จอมวานรองค์การ ไทอิวิ)，以上均由泰国人自己编绘出版。

二、视听的传播(影视媒体)

《西游记》在泰国除了通过文本翻译形式进行传播外，还出现了泰国华人圈喜爱的戏剧和泰国当地播放的电影和电视剧。《西游记》以戏剧推广的范围大都在华人圈内，而早期都以潮州、客家或福建等方言进行宣传。虽

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后来也传授给当地人，慢慢地以中、泰两种语言互动传播，不过《西游记》泰语版本的戏剧就算曾有，也没有记录，不易查考，所以本文只能对电影和电视方面加以介绍。《西游记》电影进入泰国比电视早。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所拍的电影《西游记》大概20世纪60—70年代在泰国放映，是泰国人第一次用视觉接触《西游记》故事的起点。可以说，让泰国大众(华人圈外)广泛知道《西游记》故事的正是港版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所拍的《西游记》。

1993年从笔者关于泰国人如何熟知《西游记》故事的调查问卷看到，大部分泰国人首先是借由电影传播方式得知《西游记》故事，其次是教科书和儿童漫画等。泰国观众对《西游记》印象深刻的内容按循序是《芭蕉扇》(当时的泰国观众对铁扇公主故事情节的称呼)、《盘丝洞》、《大闹天宫》等，三者恰好都来自当年在泰国放映的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拍摄的《西游记》片段：《大闹天宫》、《盘丝洞》、《铁扇公主》、《女儿国》、《白骨精》等。¹

当时电影艺术和拍摄技术不是很

1 详见【泰】谢玉冰：《〈西游记〉在泰国的研究》，附录3“一般泰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看法”，第214—231页。

发达，像印度《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泰国也深受欢迎一样，《西游记》电影由于情节与佛教有关，故事里的神奇科幻，人物的灵活，在泰国一经播放，不但受到泰国华人欢迎，还受到全泰国的喜爱和接受。被泰国人喜爱的原因之一是当地电影院的配音员经常穿插泰语口语，谐趣横生，使人们对电影内容添加了更大乐趣。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所拍的《西游记》影片一直受到泰国人的欢迎，虽然时过二十余年，不少泰国人仍把它们当作珍藏品，在耀华力路上还能找到。在中、泰建交那年（1975年），泰国曼谷明星电影公司（Star Film Bangkok）还专门拍摄了名叫《哈努曼大战孙悟空》的关于中泰神猴交战的电影。这部电影特别吸引当时的泰国观众，因为哈努曼在泰国人的心目中是个武力超强，轻轻一跳就能跨越楞伽城，只要念咒语身体即变成巨山，在打哈欠的时候就会将星星从口里吐出来的神猴，他是拉玛王的最强士兵。而孙悟空的威力不比哈努曼差，由同样伟大的两者武力交战，对泰国人来说肯定比《拉玛坚》（印度《罗摩衍那》的泰文改编本）中黑白猴之间的战斗更有吸引力。这部电影跟《西游记》许多情节差不多，那里不是观音菩萨来调节，就有其他神仙来解难，这里因为战场在泰国，最后需由泰国人熟悉的湿婆神来调节，使中泰两位神猴握手



和好，代表中泰一家亲的意思。1975年后，中泰好动、固执、调皮的两位猴再也没有交战过（类似这部电影也没有再拍了，后来泰国只拍了一部哈努曼那与日本奥特曼斗战的电影）。

泰语电视版《西游记》跟电影的时间差大概十年，原因不仅是《西游记》由电视播放的历史稍微晚些，还因为电视这种娱乐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才慢慢在泰国流行，之前并不是家家都有电视。《西游记》连续剧初现泰国

是1981年日本版电视连续剧《西游》（由界正章扮演孙悟空、夏目雅子扮演三藏法师、西田敏行扮演猪八戒、岸部四郎扮演沙悟净）；第二次是1997年港版《西游记》（由张卫健扮演“行者”，江华扮演唐僧，李耀祥扮演猪八戒，麦长青扮演沙和尚），这次播放张卫健版《西游记》让泰国观众大大享受了故事的趣味；第三次是1999年版《西游记（第二部）》（由陈浩民扮演“行者”，其他角色的扮演者和第一部一样，外景取自中国内地）；第四次是2001年版《西游记》（曹勇扮演行者，李汉彪扮演猪八戒，黄海冰扮演唐僧，李京扮演沙和尚）；第五次是2003年版《齐天大圣》（张卫健扮演“行者”）。除了第一部和第四部以外，其他全是香港出品的电视剧。之所以选择《西游记》在泰国播放，原因之一是故事情节本身很有吸引力，原因之二是某些演员在泰国很有号召力，带动了电视剧的收视率。如自2000年以来，演员张卫健在泰国大受欢迎，所以第三频道的负责购买电视剧的人员，就优先选择了他主演的《齐天大圣》，于2003年播放。¹虽然香港最近几年拍摄的《齐天大圣》中“行者”的某些形象已经离原先的故事太远了，却在客观上使以往只知道潮州话“行者”的泰国观众，熟悉了另一个普通话的名字——“齐天大圣”。在播放的众多电视连续剧中，还有中国著名的卡通

1 笔者于2003年7月30日采访泰国电视台第三频道，从引进中国节目的管理员——彭帕·库哈皮南先生(พงศ์พันธ์ คุณภณินัท)处得知。

版《西游记》。

三、泰国华人庙宇里的《西游》

作为一部中国长篇经典小说，由于八十一难中，大都是神仙协助民间解除各种祸难，因此《西游记》在漫长的播放时间里不难融入民间百姓生活。除了娱乐外，它还是民间灵魂的寄托。对于中国民间崇拜《西游记》中的故事人物，其中又以孙悟空信仰为主这一现象，清末已经有证明材料。如《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清代褚人获《坚瓠余集》卷二“齐天大圣庙”就有记录说，“福州人皆祀孙行者为家堂，又立孙悟空庙”。还有几本古代文献指出相关信仰在福建存在。笔者2003年到中国福建省田野考察时，也发现福建是中国信仰孙悟空的圣地。在考察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时也发现，神猴行者或民间称呼为“大圣佛祖”信仰的来源地应该就是中国的福建。

为何中国崇拜孙悟空的风俗主要流行于南方沿海一带的福建、广东、台湾等地？笔者考察分析，认为原因可能如下：由于西晋、北朝、北宋时期北方战乱，中原王朝被迫南迁，国都也随之迁到南方（如东晋、南朝、南宋等），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兴起和扩张，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这一现象的写照。闽南地区的海外交通发展很早，从唐代开始，泉州就同东南亚、南亚甚至远至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国家有交通贸易往来，南宋至元代，泉州港是世界最大的贸易

作为一部中国长篇经典小说，《西游记》在漫长的传播时间里，由于八十一难中，大都是神仙协助民间解除各种祸难，《西游记》不难融入民间百姓生活中。

港口之一。有贸易就有交流，而交流是相互的，中国的文化传出去，海上丝绸之路的途经地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文化也流传进来，而印度的神猴哈努曼也许就是在这种互动中进入沿海地带并与中国猿猴故事结合，使孙悟空有了如哈努曼般威力的形象，促成了神猴崇拜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

闽南人不但把闽南文化带到台湾、粤东及大陆的许多地方，还带到了海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与海外的贸易繁多，闽南人到国外后，自然也就把闽南文化带出去；另一个原因是，闽南人很能打拼，当年为了生活纷纷离乡背井，相携到南洋一带谋生。几百年来，闽南人在那里生息繁衍，闽南文化也就随着他们在南洋各国生根发展。随着清末大量闽、粤等地的华人移居泰国，孙悟空崇拜乃至《西游记》都被带到泰国，尽管这是不同的流传线路，它们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其实何止孙悟空与《西游记》，即便孙悟空崇拜也不是单一的传播途径，而是经由多条不同的线路

流传到泰国各地，它们有同有异，呈现不同的表征。

在信仰方面有些情况是很特殊玄妙的，越不真实越对人类心灵产生更真实的力量感。在泰国除了能找到中国历史上的真人唐僧的几座庙宇外，还能找到更多祭拜观音菩萨、哪吒和“齐天大圣”的庙宇。祭拜孙悟空为“大圣佛祖”，不是因为文本泰译《西游》或影视传播影响。《西游》由崇拜信仰途径流传到泰国，应该早在18世纪末，随着当时华人移民泰国就有了。只不过当时华人只在自己住所安放神位，不像今日普遍地流传。根据笔者二十余年的田野考察、收集整理资料发现，祭拜孙悟空或信仰所谓“大圣爷”、“大圣佛祖”和“猴面神”（泰国当地之称）的风俗在泰国的流传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一件事。泰国中、南、东、北部都有把孙悟空作为神仙敬仰的踪迹。粗略统计，泰国供奉孙悟空的庙宇应该超过40座。其中香火最旺的以曼谷、春武里和普吉府为主。相关人员大都认为曼谷唐人街耀华力地区的拉玛四路上的“大圣佛祖庙”是泰国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大圣寺庙。曼谷地区较有影响的孙悟空庙宇还有：达铃参地区的“大圣佛祖庙”、巴通弯地区的“大圣佛祖庙”、地丹地区的“齐天官”、三盘他翁地区的“大圣佛祖”、拍耶泰区的“齐天官”、棒肯区的“西天佛国”等。

东部春武里府也是信仰大圣爷很盛行的地方之一，而且21世纪以来华

商机构陆续组织重盖了不少中式庙宇，一般都会安放“大圣佛祖”神位。其中有：春武里直辖县的“大圣庙”、扮棚县的“大圣古庙”、帕那尼空县的“南天门大圣佛祖庙”、浓里县的“仙山齐天官”、扮算区的“大圣佛祖庙”等。其他东部地区的代表性庙宇有：北标府抱木县的“猎人洗鹿井”的“大圣佛祖庙”、玛卡洞的“大圣佛祖庙”。在华富里府，据了解该城最少有两座大圣庙，分别在财八单县和木盎县等。

南部地区则集中在普吉府和合艾府，尤其普吉府的百姓祭拜大圣特别普遍。在普吉岛几乎每一个中国庙宇中都供奉有大圣的神像，如“福元宫”、“观音庙”、“斗母宫”、“女玄天九宫”等。据调查，近年当地将会有专门祭祀大圣的庙宇出现。合艾县有九座代表性的“大圣佛祖庙”，除了当地人祭拜外，通常新加坡、马来西亚人也来这里庙宇祭拜。泰国南部的这类庙宇有：春蓬府直辖县、那空是贪玛拉府、南部董里府的“瞞拉庙”及也拉府押杜直辖县的“庆佛寺”。

此外，在泰国东北和北部地区发现的齐天大圣庙宇有：甘烹碧府的“齐天大圣庙”，庙里供奉着全泰国最高的大圣神像，还有乌隆府的“吁隆齐天大圣坛”等。¹

泰国所祭拜的孙悟空塑像原从中国引进，不过目前已有不少塑像是泰国当地塑造，随着泰国华人经济地位

它不仅在日本受到极大欢迎，在欧美国家也涌现出多姿多彩的英、法、德、西语版本。

.....
的提高，许多华人协力建筑了中国寺庙。寺庙里安放的“大圣佛祖”等一直有夸张的现象，如有的塑造成全泰国最高的大圣塑像，有的则恍如观音菩萨（呈现泰国佛陀的秀气、端庄、雅致）。曼谷旅游景点有祭祀四面佛的，还有三头一身的大象。21世纪的“大圣佛祖”也随着泰国当地信仰文化，被塑造成三面一身的大圣佛祖。很特别的风俗是，越来越多的神话塑像安放在旅游景点。不过，福州香火盛旺的五色兄弟大圣的形象，却没有原封不动地流传到泰国。孙悟空塑像的创造在泰国还是结合了当地文化，有所创新，这可以看作是《西游记》故事中人物信仰在泰国的再现和衍生。

小结

诸多中国经典小说传播到国外，有的被接受国欢迎，也有的被排斥，即便受到接受国的欢迎也有不同的接受方式和程度。对存世五百余年的神魔小说《西游记》来说，我们从未发现它被某些国家排斥，这个现象可不

常见。它不仅在日本受到极大欢迎，在欧美国家也涌现出多姿多彩的英、法、德、西语版本。至于早就对印度神猴哈努曼故事耳熟能详、喜爱有加的东南亚国家，怎能不很快地接纳极似罗摩王与神猴哈努曼的唐僧与神猴孙悟空？泰国是《西游记》众多粉丝国之一。在有记载的《西游记》流传到泰国的百余年内，无论何种传播途径都存在着不断地“再现”和“衍生”的现象，就像三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第一棵是文本流传，有全译、节译、改写、改编等众多分支，也有佛教化的附会之本，还有儿童绘画本系列。第二棵是影视流传，有中国（包括大陆、港台地区）、日本的影视作品，还有泰国本地的作品，有忠实于原著的作品，也有创作力度超乎想象的衍生之品。第三棵是信仰崇拜，源自于中国闽粤台地区，又在泰国各地生根开花，一座座庙宇拔地而起，一尊尊塑像安放就坐，孙悟空的精神也就逐渐植入人心。每当这些文化现象“再现”之时，要么在保留主体之下有所更新，要么在删减之余又有所补充，要么是创新力度超大的再创作。这些衍生是泰国华人或本地人对《西游记》及神猴孙悟空的“泰国文化化”，使之在当地焕发出永无止境的生命力。

1 有关孙悟空信仰详情可参考：【泰】谢玉冰：《行者——齐天大圣：从文学形象走向神坛的猴子》，曼谷：艺术文化出版社，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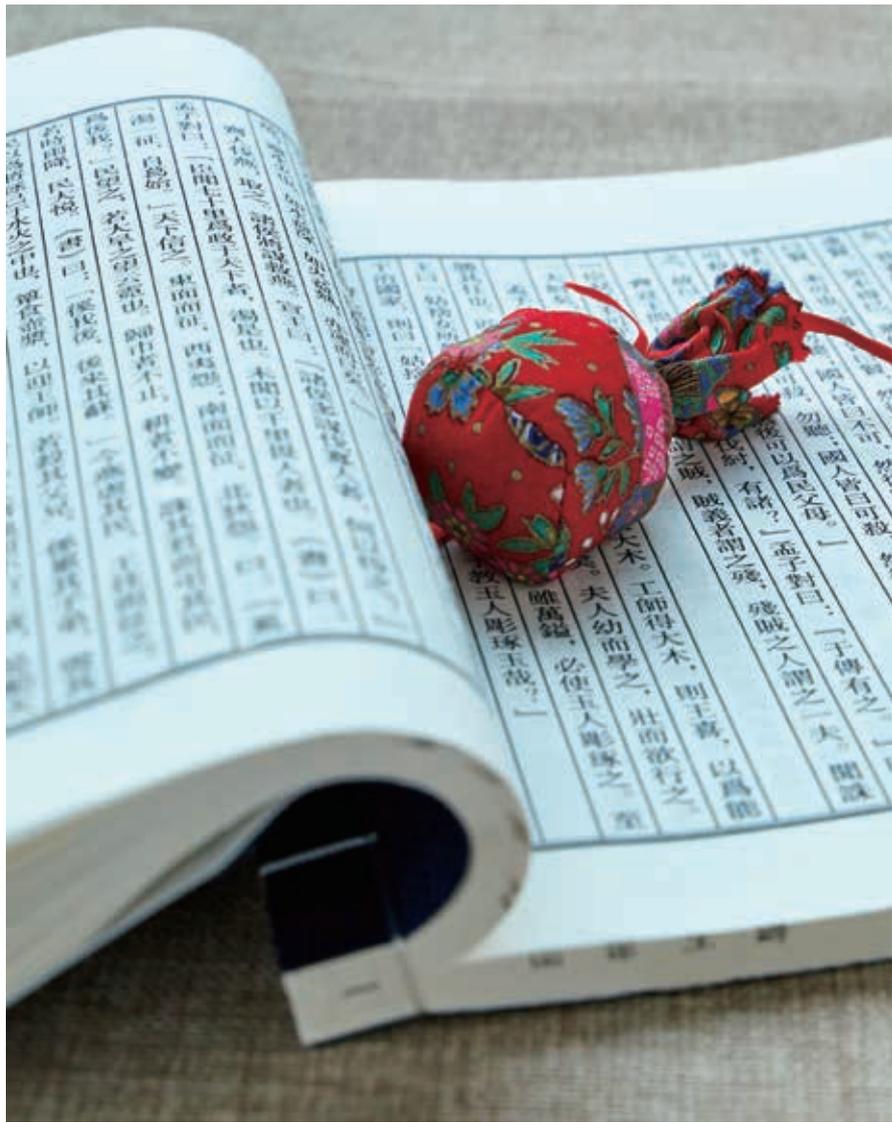
译介的儒家思想在域外的接受与影响，如朱谦之、庞景仁、张立文、林金水等。

(3) 以传教士汉语文献为核心，从中国思想史的书写立场探讨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诠释与运用，如陈卫平、孙尚扬、李天纲、刘耘华、陈义海等。

(4) 以传教士外文文献为核心的文献综述及个案研究，多集中于19—21世纪儒学典籍的英译本及其翻译思想研究，王辉、岳峰、李新德等人的研究以史料收集及文本分析见长，杨慧林、谢天振、王克飞等则致力于在理论深度上有所开拓。涉及17—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儒学译本的研究屈指可数，其中，赵晓阳、孔令云、谭树林、李新德等先后针对明清来华耶稣会士“四书”“五经”外文译本篇目进行基础文献调查；吴孟雪、张西平、张国刚、吴莉苇等则率先分析耶稣会士外文著述中对于中国宗教哲学、历史地理、政治体制以及语言文字的介绍，不仅直观呈现中国文化带给欧洲启蒙思想界的思想冲击，也试图厘清明清中国天主教史与欧洲早期汉学史之间的关系。上述研究有首开先河之功，但其中涉及“儒学西传”的源头，亦即对于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拉丁文译著的介绍多为转引，未能直接从原始文献出发。

◆ 国外研究方面

欧美学界凭借语言优势和利用原始档案的便捷成为上述领域的研究重镇。他们率先编订、出版明清来华传



教士中外文著述的索引目录，在此基础上涌现出艾田伯（René Etiemble）、毕诺（Virgile Pinot）、利奇温（Adolf Reichwein）、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人的史论名作。当代研究以原典分析为中心，研究视角上趋于多元：如最早梳理来华耶稣会士“四书”西译史并考证其翻译底本的孟德卫（David

Mungello）；从比较哲学视角考察耶稣会士“理学”观及其对儒学形象进行“理性化”建构的伦贝克（Knud Lundbaek）、郎宓榭（Michael Lackner）和詹启华（Lionel Jensen）；从接受史角度研究传教士儒学论述与莱布尼茨“自然神学”、沃尔夫“实践伦理观”相互关系的李文潮和秦家懿，以及在新教

传教士理雅各的儒学译述研究上极具代表性的费乐仁 (Lauren Pfister) 等。但从跨文化译介角度, 系统地总结并反思耶稣会士儒学译介实践的研究并未出现。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前有王国维、钱钟书, 后有杨慧林、王辉等人从文化外译的角度, 对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乃至民国学者的儒学译著及其影响进行系统的研究; 当代海外学者郝大伟 (David Hall)、安乐哲 (Roger Ames) 以及陈荣捷、杜维明等人的儒学新译亦引发学界持久的讨论; 谢天振、王克非、许钧、许渊冲、林戊荪等人更就中国文化典籍外译, 提出一系列的理论思考及实践指导。但在立足拉丁文原典并从译介学角度深入考察“儒学西传”的源头, 具体解析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译著及其翻译思想, 进而汇通性观照 17-21 世纪儒学典籍外译的整体面貌、总结并反省其历史经验, 国内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仍有待开辟。

(二) 选题意义及价值

(1) 从跨文化译介的角度看, 明清来华传教士对儒学典籍的译介, 直接促成“中学西传”与欧洲启蒙思想界之间的互动, 除去借助中国奉教文人润色出版的中文儒学文献, 来华传教士个人的真实想法以及彼此间的意见分歧直观地保留在其外文译述中。本课题注重借助传教士拉丁语译本的整理与研究, 不仅开辟儒学拉丁文文献译介研究的新视野, 为中国学界的

研究提供新材料; 同时, 借助传教士译介儒学典籍的真实历史经验, 亦可丰富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个案研究及理论思考, 探索文化形象建立的来龙去脉, 辨析跨文化交流、文化间对话的创见与误读。

(2) 从全球史及跨学科研究的角度看, 传教士的外文儒学译本, 不仅体现了儒家文化在西方认识外部世界的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亦是中国明清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题的开展有助于从中国自身的研究立场直接审视这批儒学拉丁文文献, 反观国外的研究成果并为之进行辩难, 从而拓展中国学界的研究范式, 为比较文学、比较经学乃至传统儒学研究提供新思路。

(3)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 明清来华传教士在其译述中最早针对儒学宗教性的问题展开讨论, 他们之间围绕“耶儒异同”以及中国礼仪的性质展开的讨论, 亦引发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转折。本课题由外文原典出发总结其儒学观的特点、矛盾性及理论依据, 可进一步深化国内的“中学西传”研究, 进而以更为复杂、多面的观点来研究异质文化之间交流的形式、内容和规律。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 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 主要内容及重难点

本课题立足外文原典, 拟以《论语》这一儒学典籍的代表作为例, 通过梳理 17—18 世纪多个《论语》译本并对

其中核心儒学概念的跨文化译介进行分析, 如实呈现儒学典籍早期西译的具体情况。

本研究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 内容简介、版本考察及译本的影响概述

早期儒学译本, 无论是其译文内容、排版方式抑或它们出版后在西方启蒙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 在儒学西传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其中有部分译本更是采取中拉双语刊印的方式, 借助当时来华耶稣会士所开创的注音系统, 首度将汉字的音一形一义系统成功介绍到欧洲。而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于这批译本的极大关注与不同反馈, 亦是目前学界亟待加强的研究课题。因此该部分介绍在儒学典籍外译、双语刻印史以及欧洲思想史上皆具有重要意义。

◆ 儒学观研究

通过耶稣会译者对于《论语》书中核心儒学概念的译介, 可由此确定他们所参照的儒学原著底本及注本, 从中总结出他们对儒家思想的理解程度、个人的主观阐释及其判断依据。

◆ 译介观探讨

汇通性考察早期各个译本, 可发现其耶稣会译者在译介方法上采取的一系列调整: 从一开始逐字对译、一词多译的方法, 到此后个人阐释部分的大量添加 (用下划线标示 / 以斜体字区别于典籍原文) 以及逐步实现一词一译的做法, 试图解释简洁古文背

后深刻而隐晦的思想内涵。而在此过程中，其考察框架乃至评判标准亦由西方的神学观逐步向中式的礼法标准靠拢，不断致力于寻找中西文化之同。而由其自序及译文中的阐释部分，可总结出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典籍译介方法，为当下中国文化典籍外译活动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以深化其理论思考。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结合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依据不同的译者在翻译意图和文化立场上的延续及改变，逐部考察其译文的特点并总结其翻译策略，并对其儒学观的多样性及矛盾性进行分析。由此引出研究中的下列难点：

第一，与传教士儒学译述相关的拉丁文、法语、意大利语等欧洲语种文献的搜集与翻译；整理传教士拉丁语手稿及刊本所需的文献学和版本学知识，并对多个译本之间的系谱关系进行考辨。

第二，由于著述者是天主教来华传教士，需对其教育背景、传教方针及群体利益有所了解，以做到“知人论世”；在深入理解其儒学译述时，需在基督宗教文化、西方神哲学尤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方面有一定的知识积累。

第三，要对“四书”、尤其是《论语》一书的思想及其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有准确的把握，并对该书最主要的注本，尤其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所作的注释有深入了解。

（二）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1）本研究立足西文原典，通过

系统梳理来华传教士的“四书”译介团队、多部《论语》译著的成书史、版本谱系、主要观点及其出版后的影响，有助于在全球视野下澄清早期儒学西传的具体进程，进一步完善儒学学术史的脉络梳理，弥补国内研究中拉丁文文本分析这一薄弱环节。

（2）来华传教士对儒学典籍进行跨文化译介时，会依据所处时代语境的需要，将不同文化体系中概念符号的“名”与“实”进行人为的“虚拟对等”，使其译介活动成为理念辩争乃至争夺中国问题发言权的手段。本研究将从共时及历时两个维度，一方面综合考量明末清初传教士译者如何译介核心儒学概念（“思想载体”）并分析其背后的翻译策略，致力于思考儒学概念在跨文化译介中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有效解决方式；另一方面利用“他者”的眼光提供审视自身的新视角，将明清来华传教士群体对于儒学的认知并与具有“本土意识”的儒学研究进行

辩难，开拓传教士汉学研究的新范式。

（三）基本思路及方法

◆ 历史文献梳理

以来华传教士研习儒家“四书”的代表作《论语》为主线，使用中西方版本学研究法，对耶稣会士在1662年—1711年完成的3部拉丁文译作及其转译本进行系统的文献整理，其中所涉及的原始文献包括：

（1）最早的《论语》译文刊本：《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 1662），计38叶，对应《论语》前10章的内容。

（2）影响最为深远的早期《论语》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论语》（*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该书堪称欧洲启蒙时代的东方《圣经》，出版后备受关注。出版次年随即在阿姆斯特丹出现该书的法语节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1687），语言通俗易懂，受众群进一步扩大。1691年，基于这一法语节译



本的英文转译本《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亦在伦敦出版。

(3) 重构儒家形象的代表作:《中华帝国六经·论语》(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1711)。1784年在巴黎亦出版该书七卷本的法语转译本《中华帝国的六部经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

此部分重在厘清各部文献译述者的生平、考证其成书及刊刻时间,概括其主要内容、梳理其谱系关系并将其置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阐述其价值。

◆ 翻译思想分析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借助形象学及阐释学的方法完成文本细读:首先勾勒出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于《论语》文本理解、译介的真实情况,进而结合时代背景及其“接受视域”中的前见(经院哲学及神学训练、对中西文化意象不自觉的比附、基督宗教中心观等限制因素),解析来华传教士对待儒家文化态度的具体成因。进而综合考量耶稣会士译者的儒学观,运用“概念史”的分析方法,选取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传统儒学研究中共同关注或是有明显意见分歧的儒学概念,反思传教士群体进行跨文化译介时,如何采取“以耶释儒”“以史注经”“割裂或有意倒置概念的历史语境”等译介手法,实现儒学概念“名”与“实”的分离、重新建构并分配其新的概念意义,对其评判标准进行反思。



项目名称：中韩首脑外交与东北亚区域治理

项目负责人：张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立项时间：2018年5月

项目介绍：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和价值

(一) 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中韩首脑外交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于中韩首脑外交在东北亚区域治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研究则更是乏善可陈。

(1) 学术界关于首脑外交多有论述,为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比较重要的学术基础。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对首脑外交的研究更多停留在案例考察和现象描述上,关于首脑

外交的理论研究屈指可数,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首脑外交的概念、产生与发展的逻辑、首脑在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及其未来走势还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虽然美国学者戴维·邓恩(David H. Dunn)在其主编的《最高层外交》中,系统地提出了首脑外交的分析框架,明确了首脑外交的内涵,考察了其历史发展过程,解释了形式多样的首脑外交的不同作用,并分析了首脑外交利弊。

(2) 有关首脑外交的研究多从大国关系角度切入,但关于中韩首脑外交的研究则相对来说非常薄弱。关于

首脑外交，学者们较多地从大国之间的首脑外交展开，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美、中日、中俄等部分大国之间的首脑外交的研究上，专门探讨中韩首脑外交的论著较少。如林振江著的《首脑外交：以中日关系为研究视角》和郑华的《首脑外交：中美领导人谈判的话语分析1969—1972》都是探讨中日和中美首脑之间的交往，关于中韩首脑外交的研究则相对来说非常薄弱。

(3) 国内关于中韩关系的著作和论文比较多，但是研究中韩首脑外交在推动东北亚区域治理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的成果则是乏善可陈。戴士权的《中韩建交以来关系的评析》则以中韩关系的过去作为历史的节点，强调了中韩关系要以之前取得的进展与成果为契机，推动两国领导人向更深层次发展与进步。韩国首尔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崔斌梅在《中韩接触20年关系》一书中论述了两国领导层面推动中韩伙伴关系发展的过程。但目前学术界对中韩首脑外交在推动东北亚区域治理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的成果则是乏善可陈。所以本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选题意义和价值

首脑外交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出面参与和处理对外事务的外交方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因其政治级别高、效果显著、影响重大等特点，作用日益突显，并

且受到国际社会普遍重视。中韩之间的首脑外交起于1992年。1992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访问中国时，两国外长签署的《中韩建交公报》使得两国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1998年，金大中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方向。2008年，李明博访问中国将中韩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时签署的《中韩联合声明》，拓宽了伙伴关系的内涵。两国首脑还在国际重大场合中实现了多次会晤，两国首脑坦诚友好地交换意见并且达成众多共识，对于解决东北亚问题、加强东北亚区域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研究中韩首脑外交与东北亚区域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

本课题将主要研究中韩首脑外交和中韩首脑外交在东北亚区域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重点是中韩两国首脑之间的交往在推动东北亚区域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难点是如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 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 内容方面

学术界关于中韩首脑外交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对中韩首脑外交在东北亚区域治理中发挥的作用的研究则更少。本课题将对中韩首脑外交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中韩首脑外交在解决东北亚重大问题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 观点方面

第一，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稳步发展。首脑互访是双边关系的晴雨表和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通过领导人互访直接就共同关心的双边与国际问题进行谈判，能够更加高效地解决分歧，达成



共识,促成合作。而将首脑会晤定期化、机制化,更是表明两国之间在促进各自发展、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第二,中韩两国首脑外交起源于1992年建交之时。建交后,两国政治关系发展顺利,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迅速推进。两国首脑还在国际重大场合中实现了多次会晤,两国首脑坦诚友好地交换意见并且达成众多共识,中韩首脑外交在东北亚区域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材料方面

本课题将利用中国政府文件、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等其他政府机构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网等权威网站的资料与数据开展研究。除了利用中方官方文献资料外,本课题组也将大量利用韩文原文文献来进行研究,材料具有权威性。

(三) 基本思路和方法

首先,从理论上阐释首脑外交内涵、首脑外交对全球治理的作用。其次,论述中韩首脑外交的缘起与发展。最后,深入剖析中韩首脑外交在东北亚区域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课题拟在广泛查阅、搜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力求深入阐述和剖析中韩首脑外交在东北亚区域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项目名称：安冈章太郎小说中的对美情感研究

项目负责人：杨炳菁（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

立项时间：2018年5月

项目介绍：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和价值

安冈章太郎是日本战后“第三新人”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本课题以安冈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冲突为研究重点,分析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日本二战后产生的对美国的情感。

(一)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及本研究的价值

◆ 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日本对安冈章太郎的研究起步

较早,其研究大体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日本评论界以前活跃在文坛的“战后派”文学为参照,认为安冈章太郎的作品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但与其他“第三新人”作家一样,缺乏对政治的关切,思想性、政治性、批评性不足(服部达《新世代的作家们》,1954)。

第二阶段始于198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研究的思考框架发生巨变,与此相关,对安冈章太郎作品的评价

亦发生改变。评论家认为此前对其缺乏思想性、政治性的评价仅仅是以“战后派”文学为参照，今天应在更广阔的时间维度里审视安冈文学（胜又浩《等待的逆说》，1989）。该阶段的评论及研究开始注重挖掘安冈作品的社会性，出现了以分析安冈文学社会性为目的的作家论和作品论。

◆ 国内相关研究学术史梳理

从整体来看，国内对安冈章太郎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特点表现为：

第一，整体研究数量偏少。截止2017年，有关安冈章太郎的专著仅出现一部（魏铀原《安冈章太郎的文学和思想》，2004），对安冈章太郎文学展开专题研究的论文也仅有11篇。

第二，研究成果承袭日本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观点。国内学界对安冈章太郎文学所进行的研究其成果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日本文学研究界对“第三新人”及安冈文学所持有的主要观点。例如刘立善在《浅谈“安冈章太郎”的文学》（《日与知识》1994.2）中认为安冈的作品主旋律是“描写人因战争而受祸的灰暗的青春”。其笔下人物“为拙钝、低劣者和卑小的平民”，且“流露出一种弱者茫然失意的空虚感”。上述观点与1980年代前日本文学研究界对安冈文学的评价具有一致性。

与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所不同，日本对安冈章太郎的研究已进入到解构此前研究框架，尝试重构研究框架的阶段。但此种重构尚未完成，

特别是安冈文学中对美国情感的表现方式及内涵等内容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二）选题意义及价值

◆ 理论价值

安冈章太郎在其文学中所表现的对美情感是二战后日本在对民族自我的审视和对作为他者的美国的认知前提下而产生的。此种情感表现具有典型性和生成性。因此从对美情感出发重新审视安冈文学是研究“第三新人”文学及其后出现的战后日本文学的重要一步。

◆ 实际应用价值

“第三新人”文学所体现出的对美情感彰显了战后日本的社会心理及民族文化身份特点。作为代表性作家，安冈章太郎的创作无疑是最具典型性的。因此，通过对安冈文学中对美情

感内涵的研究可以从精神层面更为准确地了解二战后的日本。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内容

安冈文学中所塑造的人物是对美情感的主要表达者，而不同的人物身份则代表了不同的群体。通过对不同身份的日本人加以分析可以从总体上安冈文学所表现的对美情感之具体内涵。

A. 看屋人和女佣

二战后驻日美军征收日本房屋作为工作地及住房，看屋人和女佣是在其中为美军服务的日本人。他们是二战后在日常生活方面直接与美国（人）产生交集的群体，其生活形态完全受控于“接收屋”体制。

B. “征收屋”外部群体

被征收的房屋主人、与工作于“征收屋”的女佣产生感情的青年等。他们的生活间接地受到“接收屋”体制影响，与看屋人、女佣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二战后日常生活方面直接与美国（人）产生交集的群体。

C. 领政府津贴的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曾在战场上与美国（人）产生交集；退役后他们靠领取政府津贴为生，过着所谓“屈辱”的生活。他们是有着特殊经历群体的缩影，其对美情感与此前的战争体验紧密相连。

D. 英语教师

英语教师既有日本人身份特点，



同时也是日本人中直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群体。他们的对美情感体现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精英阶层如何面对民族自我及他者的问题。

安冈文学中存在不同形式的情节冲突。这些情节冲突归根到底可视为对美情感有所不同的人物之间的相互碰撞。通过具体研究日本人之间的冲突以及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冲突，可以揭示安冈文学所表现的对美情感具有怎样的动态发展。

A. 日本人之间的冲突

日本人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情感冲突。本部分将研究对美情感差异如何引发并左右夫妻之间及恋人之间的情感冲突，以及该情感冲突使个体的对美情感产生怎样的变化。

B. 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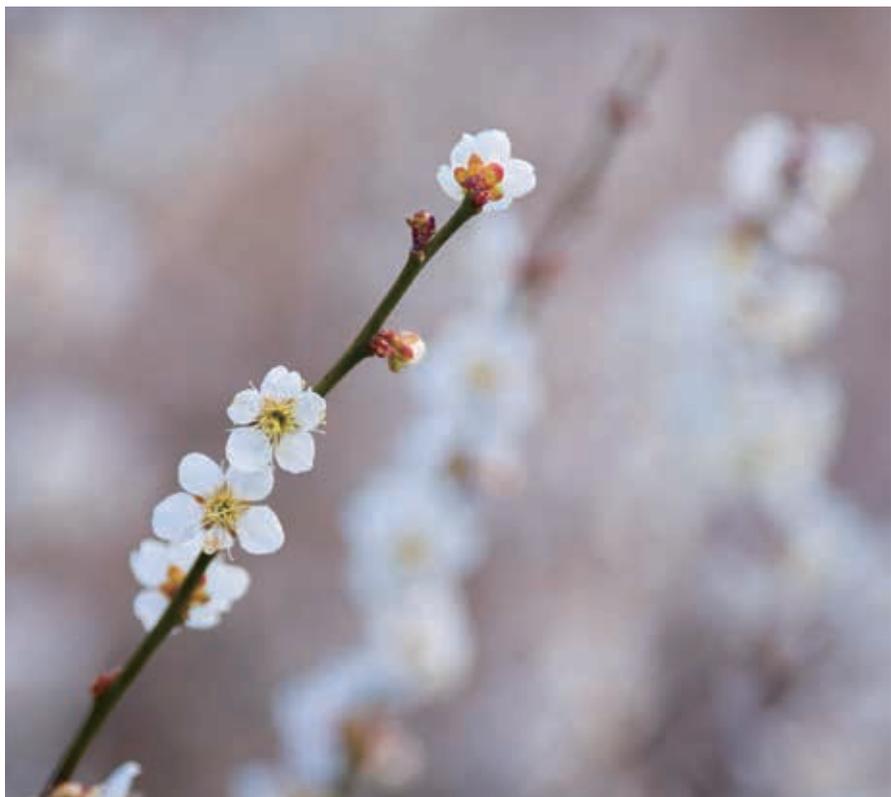
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民族冲突或文化冲突。本部分将研究不同的对美情感对冲突产生、冲突发展以及冲突消失所发挥的作用，并探讨在此过程中日本人的对美情感产生何种变化。

(二) 重点难点

本研究将重点研究具有上述特殊身份的人物在作品中如何与美国人产生冲突；而此种冲突背后所展现出何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则是本研究的难点。

(三) 主要观点

对安冈文学中的人物及情节冲突所展开的研究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揭示二战后日本的对美情感。具体来看，这一情感是在“美高日低”这



样一种民族自我身份确认及对美国认知的情况下产生。他们或表现为崇拜美国或呈现出憎恨美国，但更多的则是多种情绪交织，因外界刺激而呈现发展变化的复杂状态。

(四) 创新之处

由于到目前为止对安冈章太郎的研究基本是以日本“战后派”的文学创作为参照而展开的，因此尽管1980年代后有研究者注意到其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性，但尚未从对美情感这一角度对安冈文学加以研究。因此，本课题的研究视角凸显了该研究的创新之处。

(五) 基本思路

在对安冈章太郎文学进行全面把

握的基础上，以对美情感为主线，对其中的人物及情节冲突进行归纳。通过分析安冈章太郎文学中不同身份的人物以及不同类型的情节冲突，探讨其所表现的对美情感的具体内涵。

(六) 研究方法

◆ 文献研究法

搜集安冈章太郎作品，并在研究的整体思路下整理、提炼本课题具体研究对象。

◆ 个案研究法

对安冈章太郎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和情节冲突分别展开研究，以探明其所表现的对美情感之具体内涵。



项目名称：NHK 纪录片中的“匠人”形象构建研究

项目负责人：魏然（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

立项时间：2018 年 5 月

项目介绍：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和价值

2015 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国制造 2025》，提出了 2025 年中国迈入制造强国的目标，并成立了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切实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在这一背景下，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为特征的“匠人精神”得到广泛的关注，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弘扬这一精神，鼓励人们专注眼下，钻研工作。

说到“匠人精神”，不得不提及邻国日本。二战之后日本的重新崛起，

与推崇“匠人精神”带来的产业工人素质提高、制造业水平提高不无关系。“匠人”在日文中写成“职人”，自江户时代起，日本就已经形成了传统的匠人文化。匠人们对自己的手艺拥有一种极强的自尊心，并为此精雕细琢，追求极致。1955 年，日本还建立了“人间国宝”认定制度。政府将那些大师级的工匠、手艺人经严格遴选后确定下来并予以资金等方面的投入，以保护这些民间的“手艺”。战后日本的工业产品开始迅速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认可，“MADE IN JAPAN”成为被推崇的对象，都与日本政府的相关鼓励措施有一定关系。可以说“匠人精神”

在日本社会层面、企业层面和个人层面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为日本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匠人精神”成为国民共识层面的价值观的日本，可以预想大众媒体在其普及、弘扬及传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课题关注日本唯一的公共放送 NHK 电视台通过纪录片节目塑造了什么样的“匠人形象”、建构了什么样的“匠人精神”，并研究其用何种叙事手法进行了塑造与建构。本课题对于研究我国在弘扬“匠人精神”过程中电视媒体应发挥的作用、电视媒体应如何与国家政策相呼应，更有效地建构“匠人精神”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日本的“匠人”，远藤元男（1985）撰写的《日本職人史の研究—日本職人史百話—》介绍了日本匠人的发展历史、组织形式变迁、近代以来匠人的变化等内容，对于了解日本匠人的发展变化过程与传承方式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在近年来开始重新提倡“匠人精神”的背景下，有些学者也开始关注了日本“匠人精神”。比如王天瑞（2015）的《“匠人精神”在向“中国智造”转型中的作用》对中日德三国的匠人文化进行了分析比较，指出了日本“人间国宝”制度将匠人的技艺顺利地与社会大生产融合，转化为推动日本社会发展的动力。张琼林（2016）在《日本“匠人精神”面面观》指出了日本人的“匠人”气质从小通过对日常用品的细分与归类便得到了

培养，而“工匠精神”体现在产业工人专注每一件小事，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并将“工匠精神”精神源头追溯至日本的禅宗。江户时代著名禅僧铃木正三就提出了“工作坊就是道场”的禅修理念，提倡人们在工作中磨练自己的心性，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日本近代以来的制造业。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观点及主要内容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有：①电视等大众媒体在“工匠精神”的普及、弘扬及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②通过分析电视等大众传媒塑造与建构的“匠人形象”及“工匠精神”，可以窥见在日本已经成为一种共同价值观的“匠人文化”的内容和本质；③独具风格的叙事手法能有效促进纪录片节目的传播，对我国相关节目的制作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NHK推出的纪录片《仕事の流儀》（中文：《行家本色》）。此节目以日本各行各业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为采访对象，讲述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在日本有很高的人气，被称为日本“国民级”的纪录片。本研究首先分析这档纪录片采访对象“匠人”分类中的节目所塑造的“匠人形象”及“工匠精神”，以此来还原当代日本社会所提倡的“匠人文化”的内核。其次，本研究还将聚焦纪录片所采用的叙事手法，为我国类似题材

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借鉴。最后，本研究还将厘清节目选题制作与日本有关“匠人”政策的关系。

（二）重点和难点

本研究的重点为分析《仕事の流儀》这档纪录片塑造的“匠人形象”及“工匠精神”，以还原出日本“匠人文化”的内核。本研究的难点在于探讨纪录片制作方的选题制作等与日本有关“匠人”政策之间的关系。自1955年，日本就推出了“人间国宝”制度来保护手艺人，近12年来的政策是否有相应的变化，《仕事の流儀》作为日本人气较高的纪录片是否与政策变化有所呼应，弄明白这些问题有一定难度。



（三）创新之处

关注某种意义上“工匠精神”已成为社会共识的邻国日本，避免对“工匠精神”泛泛而谈，而将研究的焦点对准在日本民众层面有一定影响力的电视媒体，探讨其如何建构了“匠人形象”及“工匠精神”，使其在社会价值观层面得以显现、弘扬和传承，并分析此领域人气较高、播出时间较长、影响力较大的典型纪录片的叙事手法、风格及特点，都是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四）基本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

（1）分析纪录片《行家本色》所塑造的“匠人形象”。主要分析的资料为：采访对象的职业、从事手艺的内容、从业年龄、获得荣誉及称号、如何跨越事业低谷等。

（2）凝练纪录片《行家本色》所建构的“工匠精神”。主要分析的资料为：纪录片所总结的一句话“职业精神本色”、纪录片摘要中引用的被采访人关于“职业精神本色”的阐述等。

（3）在纪录片播出的12年内，日本关于“匠人”政策是否产生了变化，与纪录片的制作方的制作方针、选材倾向有无关联。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为质性分析与文献调查。上述第1及第2部分主根据收集的数据进行质性分析，主要研究方法有总结、归类、词频分析等。第3部分采用文献资料调查法，分析两者的关系如何。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婁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6556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